

The background is a detailed painting of a harbor. In the foreground, a small wooden boat with two masts is docked at a wooden pier. The water is dark with ripples.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wooden building with a gabled roof and a lighthouse on a hill are visible. The sky is a pale, hazy blue.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郁郁寡欢的童年、少年.....	002
第二章	“人是一个谜”.....	011
第三章	一个新的果戈理的诞生.....	017
第四章	死刑、赦免与流放岁月.....	027
第五章	历尽磨难话艰辛.....	038
第六章	漫游欧洲的赌徒和一场恋爱.....	048
第七章	可怕的 1864 年.....	062
第八章	《罪与罚》.....	076
第九章	最后一次恋爱.....	090
第十章	漂泊的旅程.....	101
第十一章	一部诋毁革命的反动作品.....	115
第十二章	对现代派小说的探索.....	125
第十三章	巨星的殒灭.....	139

第一章 郁郁寡欢的童年、少年

1821年10月30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济贫医生的家里。这位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几座高峰之一的伟大作家，他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是一首诗。这不仅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叫“穷人之家”的地方，而且因为他一生注定要遭遇无数的坎坷的磨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名军医。他当初怀着年轻人的激情投身博罗季诺战役，然而，他不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而是在后方医院里，在牺牲者的身上看到了战争。这种经验是残酷的，战役结束后他也复员了，那时他才30岁，却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乐趣，再也没有笑过。1821年3月份被任命为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医生，于是全家人迁居该地，费奥多尔也正是在这里降生。这个地方很久以来被认为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方之一。它曾有一片墓地，埋葬着一些被社会摒弃的人，比如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尸的被杀者等等。因此，这片特殊的地方又叫“穷人之家”，而看守坟墓的老人则被称为“看家神”，

后来这里修了一座济贫医院，医院外面的街道就叫做“看家神大街”。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弃婴收留所和一家疯人院。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并非风景优美、如诗如画的地方，这就注定了他从小就与下层人民打交道，也注定了他们将会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

有必要说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古代是贵族，他的祖先经常在历史文献中被提到，有些人也曾辉煌一时，做过首席审判官、主教等。

1506年，他们领到平斯克县境内一个叫陀思妥耶夫的村庄的特权证书，就把这块世袭领地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姓氏。这一族人性情暴烈、纵欲无度，因而诉讼案件里也常有他们的名字。例如16世纪末，有位叫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女人，她不但被指控在雇工的协助下谋杀自己的丈夫，而且还被指控蓄意谋杀丈夫前妻的儿子，并伪造遗嘱，企图侵吞他们的财产，这位像麦克白夫人一样狠毒的女人被判处死刑，只是因为国王恩准才被缓期执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祖上也出过诗人，当他的祖先离开立陶宛黑压压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后，南方的阳光使他们心中温暖，于是就开始写诗了。18世纪末有一首人人皆知的《忏悔歌》，据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爷爷写的。这个家族到18世纪渐趋贫困和没落，他

的爷爷也只有一个偏僻县城里担任大司祭这样微不足道的职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个不苟言笑、喜怒无常的人。他的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而且十分吝啬，嗜酒成癖。他这种性格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压根儿就不愿意提到他父亲，也不希望别人询问他父亲的事。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聪明温柔的女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酷爱诗歌，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很有音乐天分，能用吉它自弹自唱一些浪漫抒情的歌曲，她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以敬慕的心情谈到自己的母亲，他后来在作品中塑造温文尔雅、命途多舛的妇女形象想必也是以他母亲为蓝本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分析陀氏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认为作家本人有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精神因素其实是与他的现实家庭环境有关系的。

182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家搬到医院大楼的另一侧厢房居住，从2岁起，费奥多尔的整个童年时代就在这所厢房里度过。不久，便在穿堂里给大一点的孩子们隔出一个小单间，光线几乎照不到这个昏暗的被刷成米黄色的房里来，后来，当费奥多尔描写

彼得堡那些像橱柜或棺材盒一样狭小，甚至连思想也不能自由驰骋的阁楼时，他大概回忆起了“看家神大街”上这间昏暗的斗室，他在这里发展了他那些想入非非的幻想。

尽管童年生活单调压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他经常带着好奇深思的表情端详那些憔悴不堪的病人或者跟他们攀谈。大概从那时起，贫穷、痛苦一类的事情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吧。他的家里雇着一些农奴出身的奶妈，这些乡下女人没有文化，可却是她们最早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她们给他讲很多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作家不止一次提到那位莫斯科奶妈阿廖娜·弗罗洛夫娜，说她是一位心灵十分高尚的平凡妇女，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用充满诗意的手法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也许正是这种民间口头创作，促进了作家那些伟大作品的语言的诞生，那是一种完全符合俄语规范并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乐趣，比如观赏俄国建筑艺术的珍贵遗迹和民间绘画作品。他晚年回忆道：“每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大教堂，对我来说都像是一种隆重的仪式。”他有一位外房曾外祖父叫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科捷利尼茨基，是莫斯科大学的药理学教授，博学多识，幽默风趣。由于膝下

无子，非常喜爱他的外房小外孙，常常领着他们去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看了戏团的小狗、猴子以及蜡制的王子和大元帅。10岁时他还看了席勒的古典戏剧《强盗》的演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还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就是他的姨母库马宁夫人，她经常坐着豪华的马车来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她给他们灌输了金钱万能和笃信宗教的思想。忠于教会和君王，尊奉正教的传统习惯，不断使自己保险柜中的金钱得到扩充和增加——这便是中等市民和大商人阶层的最高理想。姨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有一个书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旧约和新约故事汇编，因为其中充满紧张的戏剧情节和抒情色彩。还有一种18世纪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里芙创立的“哥特小说”，这种小说经常写发生在哥特式城堡里的一些阴森恐怖的事情，情节曲折复杂，离奇古怪。在漫长的冬夜里，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屏着呼吸，惊喜万状地凝神谛听父母睡觉前大声朗读这位英国女小说家的鸿篇巨制，然后昏然入睡，夜里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不过他的父母可没意识到他们已在这个小男孩心上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呢。

1832年，一场大风引起的火灾烧掉了他们在

图拉省的地产。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在 1827 年晋升为八级文官，拥有贵族身份以后购置的，它有两个小村庄，不过是一片荒凉的旷野，土地贫瘠，当地居民愚昧无知，死亡率很高，而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他们滥施淫威，肆无忌惮地抽打他们。大火将村庄烧得一干二净，景象惨不忍睹，人们更加贫困了，不过在当时农奴制下的俄罗斯，又有哪儿是乐土呢？

1831 年 8 月，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0 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幻听，以为听到了狼叫，吓得号啕大哭，当时正在犁地的白发苍苍的老农夫马列伊，赶忙撂下手中的活计，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后来作家在一篇随笔里专门记叙此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老农夫马列伊使他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农民的心灵中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感情！

1833 年，费奥多尔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进入由法国人舒沙尔开办的一所半寄宿中学念书。在这之前，他们受到的是家庭教育，父母从叶卡捷琳娜贵族女子中学给他们请来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堂执事，他善于娓娓动听地给孩子们讲述圣经里洪水的故事或约瑟的奇遇，另一位就是那所半寄宿中学的创办人舒沙尔，他最早使费奥多尔接触到法国文学的精读课本。而他父亲亲自教他们拉丁文，可这位军医对孩子们要

求十分严格，语法问题稍答错一点就大骂“笨蛋”、“白痴”，甚至拂袖而去，所以费奥多尔对拉丁文和古罗马文学从来就不感兴趣。

1834年秋，兄弟二人转到列奥波利德——切尔马克寄宿中学念书。在这里任教的都是莫斯科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和学者，而且这所学校偏重文学课程。所以这所中学的学生都阅读过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诗歌作品。那段时期俄罗斯文学受到一系列打击。波列伏依主编的《莫斯科电讯》被查封，年轻的别林斯基编辑的《望远镜》被勒令停刊。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精神失常，纳杰日金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普希金在决斗中饮弹身亡，莱蒙托夫被发配到高加索，果戈理则怀着悲愤的心情到国外旅行去了。尽管如此，文学还是蓬勃地发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课间休息时可以看到这个面孔苍白的孩子手不释卷，他很少和别人一起玩耍，自由活动时间常和高年级同学凑在一起聊天。他喜爱卡拉姆津、司各特、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作家。他还喜欢另一类人物，就是那种精神情趣高尚、心灵纯洁并怀有崇高理想的人。这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加兹大夫。1828年加兹被任命为莫斯科监狱的总医官，他取消了“铁棒拷打”的刑罚，解往他处的囚犯他总是让人给他们换上较轻的脚镣，他把许多囚犯留在莫斯科悉心治疗，

而其他囚犯他总是亲自送他们一程，并慷慨解囊，供给财物。1852年当他与世长辞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是警方出钱把他埋葬的，而他的名字却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苦役犯中永远流传。这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博爱精神，就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一样，它使作家受到震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加兹式的人物。

183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因患肺病去世。她的死是一个悲剧，这完全是由她丈夫造成的。尽管她温柔贤惠，可还是经常受到丈夫的无端猜忌和责难。在她写给丈夫的信中，可以看到一颗纯洁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怎样无辜地蒙受痛苦：“……尽管我心中充满着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位体质虚弱的女人在35岁时已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去世以后，孩子们由她的姐姐库马宁夫人抚养。母亲的死和“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的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普希金的死震撼了整个莫斯科，不过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都守候在母亲的病榻旁，所以直到回到寄宿中学，兄弟俩才知道这一消息，费奥多尔对哥哥米哈伊尔说，

倘若不是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这时，兄弟俩对文学的爱好都开始表现出来：哥哥渴望成为一位诗人，每天写三首诗；而弟弟则醉心于离奇的幻想故事，这和小时候听多了安娜·拉德克里芙的小说分不开。183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部取材于威尼斯的小说，因为安娜小说中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意大利。

母亲一去世，家庭就彻底崩溃，父亲离职退休，两个孩子由库马宁夫妇领养，费奥多尔和哥哥被送到彼得堡，打算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书籍，克里姆林宫……童年时代的一切美好事物都随风而逝，而他要在彼得堡开始崭新的生活了。尽管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一些如金黄色的阳光一样的回忆，但整个基调是黯淡的，他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童年往往也是郁郁寡欢，这大概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第二章 “人是一个谜”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和哥哥被送进军事工程学校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对这行根本没有兴趣，不过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写诗是一种无聊的事情，对米哈伊尔的那些“蹩脚诗”非常生气。他觉得研究军事工程技术才是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在西部的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是一件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两个儿子被送进军校，戴上了高筒军帽，领到了火石枪而不是古典文学课本。

与席勒年少时进的“奴隶养成所”般的军事学校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幸运一点，不过军校生活仍是严格得很。在校场上，当刺刀稍有一点歪斜，教官便跑过来大声喊道：“立正！操练时不准晒太阳，立正！……”

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悄悄开始了紧张的自修，以保持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他对军事教学大纲进行了创造性的修正，用古典文学来对抗技术课本。每当夜阑人静，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并把他对一些他特别感兴

趣的问题的初步思考记录下来：“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不愿和军校学员交往，但他还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些朋友中有的后来成了自然科学家，有的成了画家，还有一位格里戈罗维奇，后来写过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发生过精神影响的是希德洛夫斯基，这位青年文学家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通过促膝谈心，促进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发展。希德洛夫斯基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面容憔悴，湿润的眼睛显得冷漠而又充满热情。由于身体衰弱而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美，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可她却嫁给了别人。总之是像拜伦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忧郁狂躁，他的诗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叹不已，但他晚年却进了修道院。不管怎么样，他们在一起漫步、交谈、争论的美好时光和“枯燥无味、毫无意义的军校生活”相比简直是一种天堂境界，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受益匪浅。

陀思妥耶夫斯基平日节衣缩食，很少朝家里要钱，反正要也是招来老头子的一通责骂，所以他平时连茶也不喝。他给弟弟的一封信里曾说，一天，大雨如注，他却在露天里站立着，口袋里连饮一口热茶的钱都没有。

到1839年，他那本来微薄的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因为父亲去世了。父亲的死只能归罪于他自己，这个老军医的性格到晚年越发吝啬、残酷。他经常喝醉了就鞭打农奴，而且强迫农奴的女儿和自己同居，人们普遍憎恨这个地主，终于有一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几个农奴密谋杀死了他。当费奥多尔获悉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他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去，这种疾病就是后来折磨他一生的癫痫病。

父亲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而他在头一年因阅读课外书使学业受影响留了级，不过这一切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一分钟也未放弃过精神上的追求，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1841年他晋升为陆军准尉以后，成了校外实习生，可以自在地居住在热闹繁华的市中心和私人住宅里了。他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在这之前写过两个历史悲剧剧本。还构思一些浪漫的爱情悲剧故事，不过一切都在酝酿之中，那直冲霄汉的一天还没到来呢。

1843年8月，他修完了军官高级官的全部课程。迎接他的是尼古拉时代的冷酷现实，由于毕业成绩不理想他没有去前方要塞而留在彼得堡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他的哥哥曾委托里森坎普夫大夫照顾他。一天，里森坎普夫回到彼得堡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只能吃到面包和牛奶，而且连这也是赊来

的。由于手头拮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以前不久曾给弟弟安德烈写过一封信：“请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寄五个卢布来吧，哪怕只寄一个卢布也行。我已经三天没有生茶炊了，我现在的的确已是囊空如洗”。这种极端缺钱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他又开始出入于豪华的餐厅，说话的嗓门也高了，显得十分自信。原来他从莫斯科收到了1000卢布。可是第二天，他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蹑手蹑脚走进里森坎普大夫的房间，请求他借给他五个卢布。原来寄来的那笔钱除偿还紧迫的债务外，一部分输在台球桌上，另一部分则被打台球的伙伴偷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彼得堡纸醉金迷的生活吸引住了，他喜欢看演出，去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狂饮滥赌，由此他也接触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他也见识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盘剥穷人、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一年最后四个月的薪水做抵押，由工程绘图处财务主任作保，向一位放债的低级军官借过一笔钱，并事先扣除了高额利息。以后他刻画了像阿廖娜·伊万诺夫娜这样的高利贷者形象，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实际接触了这一类典型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继承父亲的一项“遗产”

——贪婪、吝啬。他总是慷慨大方，有求必应，随时准备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他也想发财致富，因而他的性格总是走极端，他后来成为“拷问人类灵魂的痛苦”的文学家，和他的极端的性格也有关系。

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有可能占去几个月时间，将使他中断文学创作。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他在写给自己监护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他需要一笔资金，来开拓新的生活道路，——从事广泛的文学活动。他说：“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首要的目的和志趣！”家里人觉得他不可思议，可最后还是让步了，给他寄来了500银卢布。

23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自由文学家，这时他翻译的《欧也妮·葛朗台》刚刚出版。其实，为什么辞职他说得慷慨激昂，内心也是很迷惘的，只是莫名其妙、强烈的创作欲望时时撞击他的心灵。他成功翻译了一本小说，可他还没创作自己的小说呢，他就把工作辞了。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昔日同窗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们来到后者的寓所，格里戈罗维奇也热爱文学，

他把自己的新作朗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当读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脸不禁惊喜万分，“叮当弹跳着”多形象，多生动！只有具有非凡艺术感受力的心才想得出来。

第三章 一个新的果戈理的诞生

诗人涅克拉索夫简陋住宅的窗口，一整夜都亮着灯光，朗诵声从里面流泻出来，那声音，忽而高昂，忽而低沉，忽而如怒涛汹涌，忽而如山泉呜咽。屋子里，两位作家热切地争着抢着在读一部书稿，本来他们打算只读十页的，可是读了整整一个通宵他们也没发觉，读到最后一页时，涅克拉索夫潸然泪下，另一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也呜咽起来。其时是凌晨4点钟，涅克拉索夫欢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

是什么书稿使两位作家如此忘我，激动呢？原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那段时间格里戈罗维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一起，后者一天到晚爬在桌上写东西，至于写什么，他一字不提，格里戈罗维奇知道他的脾气，也过多地询问。一天早晨，格里戈罗维奇被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房里，听着他一口气念完了他这几天写的小说《穷人》，越往下听，格里戈罗维奇有一个想法就越强烈：他觉得费奥多尔写的东西不知道比自己写的强多少倍，以至他几次都想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等他念完，格里戈罗维奇就几乎抢过书稿，去找涅克拉索夫了，于是就出

现了开头那一幕。

涅克拉索夫读完书稿，也兴奋异常，穿上衣服就和格里戈罗维奇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睡觉算什么，我们喊醒他，这比睡觉要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敲门声中愕然地打开门，当他发现格里戈罗维奇带着一个陌生人深夜造访他时，他慌了神，脸色苍白，涅克拉索夫对他说话，半天也答不上来，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了半个小时，然后涅克拉索夫摇着他的肩膀说：“现在您睡吧，睡吧，我们走了，明天上我们那儿去！”可他哪里还睡得着，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为自己的成功激动万分。

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就把稿子拿去给别林斯基看，当他举着《穷人》对别林斯基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时，别林斯基还严厉地说：“您那里果戈理出得像蘑菇一样快！”可傍晚再去时，别林斯基激动地迎接他：“带他来，快点儿带他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不到他就要去见当时最有名的评论家了。他在别林斯基家门口逡巡，犹豫，半晌不敢敲门。但他终于还是见到他了，别林斯基急于倾吐，急于诉说，他目光炯炯、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您自己是否知道呢，您写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您像画家一样，只凭直感，凭直感可以写作，但是，您向我们指出的那个整个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

……我们竭力用语言去说明实质，而您是艺术家，只用线索，一下子就用形象揭示出本质，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到，让最懵懂的读者茅塞顿开，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这就是艺术家的为真理服务！真理作为一种才能为你所掌握，珍惜您的才能吧，始终做个诚实的人吧，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别林斯基家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着别林斯基的话，在他家的屋角下停下来，凝望着天空飘动的云朵，注视着街上来往的行人，整个心灵都感觉到生活发生了崭新的和永久性的变化。他甚至带着怀疑、怯懦和欢乐的复杂心情问自己：“我真的这样伟大吗？”

《穷人》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伟大作家的基础，这部小说继承了果戈理的《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描写被践踏在底层的人们的卑微生活和屈辱心理。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自己觉得连擦脚的破布都不如，他工作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可是别人却瞧不起他。最使他感到凌辱的是，当他因抄错了公文而被大人叫到面前时，一颗钮扣从他的衣服上掉落下来，他去拾钮扣的那种难堪、窘迫的情景，简直使他痛心得绝望。这个被不幸压倒了好心人，却真诚地爱着孤女瓦莲卡，他给她写信，为了瓦莲卡摒弃一切，牺

牲一切，甘愿卖掉自己的礼服，穿破靴子，也要满足瓦莲卡的需要。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只有星期天作弥撒时才能相见，他不敢公开看她，怕别人说闲话。当瓦莲卡知道杰符什金的不幸遭遇后，写信劝他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要坚强，贫穷并不是罪恶。杰符什金一想到瓦莲卡的爱，就觉得自己是个人，连一块干硬的面包也是自己劳动赚来的。瓦莲卡遭遇也很不幸，她已经沦落为一个卖笑女子，而这个卖笑女子的最终结局是被迫答应嫁给曾毁灭她的青春的地主贝科夫，她无路可走，只有这样才不致成为杰符什金的累赘。当杰符什金得知他所爱的人将被从他身边夺走时，他感到带走了他的整个生命，面对这个荒漠世界，他发出了悲痛的绝叫。小说里穷人的生活让人触目惊心，杰符什金的邻居高尔希科夫一家父亲失业，孩子挨饿。栖身的斗室从没有欢乐，只有凄惻的寂静、呜咽和哭泣。杰符什金觉得愤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人孤独无靠，而另一个人幸福却不招自至……为什么一个人还在娘胎里，命运就呱呱地向他预报吉兆，而另一个人却在教养院出世……”小说里唯一的亮色是杰符什金和瓦莲卡的真挚爱情，它照亮人的心灵，唤醒人性尊严。小说的现实主义图画，充满人道主义力量，开掘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新鲜的语言，带给俄罗斯文坛新的东西。因此别林斯

基说：“我就是舍弃俄国文学，也支持这篇作品。”

别林斯基的评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忘乎所以，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强烈的自信心使他产生强烈的创作激情。1846年，《穷人》刚刚出版，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又问世了。这部小说仍然动用分析的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文官，有勃勃的野心，不甘于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入上层社会。他想通过娶上司的女儿为手段，由此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小说的深刻性在于：高略德金要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并不完全出自虚荣，而来源于对生活的恐惧。因为那时的社会小人物只有两条路：要么爬上去，要么被吃掉。可惜他又没有爬上去的本领。这时，另一个人物——小高略德金出现了，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这一套勾心斗角、贪婪残忍的权术，本是老高略德金十分倾羡又不擅长的，但现在对“指导”他又感到恐惧战栗了。小高略德金并不是现实中的人物，只是老高略德金头脑幻构的影像而已，老与小的矛盾正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的冲突，反映了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高略德金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终于精神分裂，在精神病院结束了一生。别林斯基对这部小说再一次给予热切的赞扬：“从写作能力和幅

度看，这部小说都是惊人的，这是从未有过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上也认为，高略德金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在《二重人格》中，高略德金这个畏缩怯懦的小人物被帝国首都彼得堡的政治气氛吓破了胆，总感到那个城市瞪着一双警觉的眼睛在追逐他，这是和尼古拉时代的秘密警察制度分不开的，当时告密活动十分普遍，人人自危，这种精神迫害也是高略德金精神失常的原因，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

在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他经历了他的初恋。虽然这次初恋时间很短，而且是一场精神上的、理想主义的、充满诗意的恋爱。但毕竟在他一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一举成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引进文学界，在一次文学沙龙里，他见到了绝代佳人帕纳耶娃。帕纳耶娃出身书香门弟，年轻美貌、举止雍容大方，善良并富有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抗拒地爱上了她，不过这场风花雪月的事件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帕纳耶娃不但是有夫之妇，而且是发乎情、止乎礼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他受到朋友的冷嘲热讽时真诚地对他示以同情和怜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对他来说，写作也是比恋爱更重要的一件事呢。虽然这样，陀思

妥耶夫斯基以后在塑造娜司泰谢等光彩照人的形象时，恐怕也想起了帕纳耶娃的热情美丽和聪明才智吧。

事实证明，别林斯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踏入文坛写的小说过于热情的评价对他是有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才华和天赋充满坚定的信心，但他这种天真幼稚的态度遭到别的文学家的讽刺和嘲笑，屠格涅夫在涅克拉索夫的配合下，以别林斯基的口气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封带韵脚的信，这封充满讽刺的信甚至挖苦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一位年轻女郎面前当场晕倒(其实这是他的癫痫病发作，讽刺诗作者并不了解他患有这种疾病)。这些无疑使敏感而自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猝然离开社交界，不再与人交往。他甚至对别林斯基也感到失望了：“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就连他的文学见解也是朝三暮四，变化无常。”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真正分歧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方向上。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他感兴趣的是艺术自由，与实际利益无关或“不讲究实际效果的”创作、艺术创作活动的“非理性”等论点。别林斯基在40年代初就摒弃了“纯艺术”论，坚持用历史主义方法分析艺术珍品。在他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新的美学应当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并尽力促进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

确立，这种现实主义不仅要剖析生活，还要对它作出评价。他向一切幻想的、臆造的和虚构的东西提出了宣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病理分析与描摹，忽略了二重人格产生的社会根源。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故事，是需要“补充和注释的”，但陀不仅没有去做“补充和注释的工作”，反而更远地离开了现实主义。因此他1847年创作的《女房东》，1848年创作的《白夜》和《脆弱的心》陷入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泥沼，都遭到别林斯基言词苛刻的批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由相互冷淡到公开争吵，最后发展到在别林斯基去世的前几年里，一直没有再见面，尽管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地方还是与别林斯基发生共鸣，并在心底保留着对他的崇敬。与别林斯基第一次见面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刻，以后在他服苦役时就是这种回忆给了他信心和勇气。

《祖国纪事》从1849年初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要表现的是在当时道德沦丧社会中一位杰出女演员的解放斗争使命，那个社会在她的艺术光辉下突然复活了。这部长篇小说由于作者被剥夺公民权而没有写完，但从已有的结构看它也是作者青年时代最成熟、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了。小说先

描写一位优秀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新乐理的创造者叶戈尔·叶菲莫夫被贫困、寄人篱下的生活和屡遭不幸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他那无比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情绪。作者通过他的遭遇表达了自己被周围人讥笑时的心情：“天才需要同情，需要有人了解。可是你会看到，当你稍微取得一点点成就时，聚集在你周围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会把你说得一文不值，并带着鄙夷的神情看待你通过艰辛劳动、忍饥挨饿、无数个不眠之夜所取得的一切……”。叶菲莫夫的继女涅托奇卡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中长大，她因自己继父的才华未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格外崇拜他，巴不得她那受苦受难的生身母亲早日死去，仿佛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显身扬名。但当无师自通的小提琴家想在自己妻子的尸体旁一展才华时，他发现他那软弱无力的弓弦再也奏不出悦耳的曲调，这位小提琴家癫狂症发作，也一命呜呼了。可怜的孤女寄居在某公爵家，成了公爵那高傲骄矜、爱发号施令的小女儿的女伴。但涅托奇卡得到公爵前妻的女儿的保护，这是一位思想感情细腻、情操高尚并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不般配的男人，由于受到上流社会无知之辈的蔑视和她冷酷无情、官气十足的丈夫的嫉恨，渐渐死去了。涅托奇卡开始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歌唱家，注定要获得辉煌的成就和荣誉。

故事到这里中断了。尽管这部小说的描写技巧和结构是高超和无与伦比的，但这部写于1848到1849年间的小说，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竟没有一点反映，就可见作者的思想倾向已有些偏离正确轨道了。当然这种偏离被另一件事打断了。这个暂且留到后面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表现了他对天才的迷恋，他年轻时喜欢骨相学，希望别人说自己长着一副天才的相貌，喜欢别人说自己的头盖骨长得像苏格拉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一个残酷的天才，一个历经磨难的天才。

第四章 死刑、赦免与流放岁月

1846春，在涅瓦大街上，一个身披斗篷，头戴宽边礼帽的生人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前，突然问道：“请问，您下一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提问者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言谈举止与别人不同，在跟人谈话时总喜欢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他是40年代解放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出色的演说家和训练有素的宣传家。一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他组织的一些聚会。虽然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确实赞赏那种“关于国家的浪漫主义设想”，即傅立叶主义。他只主张采取和平的改良办法，惧怕走上严峻的政治道路，但他并不能阻止其他从事政治密谋活动的人们，为此他十分痛苦不安。

1849年4月15日，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抨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在此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在莫斯科争相传抄，不胫而走，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和赞叹。从陀思妥

耶夫斯基朗读别林斯基的信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他和别林斯基已经决裂，但无疑他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不过果戈理也是他崇拜的一位作家，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本人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想必使他感到十分痛心，难以接受。他还朗读了果戈理的复信，他在朗读时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后来甚至说他在任何场合都未表示过他同别林斯基信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尽管这样，他还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4月22日晚上3点多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他的家，4点多，他被一阵喧闹声惊醒，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门口响起刀枪的叮当声，“出了什么事？”他睡眼惺松地问。

听到的是斩钉截铁的大声回答：

“奉圣旨，您，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被捕。”

一名宪兵少校用十分庄严的口吻向他宣读了逮捕令，接着又用一般的命令吩咐手下的人把所有的文件和书籍都贴上封条。

门口停着一辆车，他被带到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皇上陛下直接管辖的第三办公厅”。翌日被送进了彼得保罗要塞。同时被捕的还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33名成员，罪名是搞“思想上的阴谋”。

在曾经关押十二月党人的地方，也就是阿列克谢

三角堡中的秘密监狱，侦讯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审讯，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光明磊落，他竭力为同志们开脱罪责，主动说那些导致他们走上断头台的一系列活动均应由他一人负责。他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蓬勃的信念，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的力量的作家。

长达八个月的审讯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起诉书上指控说，他宣读和传布“文人别林斯基的一封犯罪的信。”

1849年12月22日是行刑的日子。早晨7点多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小组成员20多人被囚车押送到谢苗诺夫校场。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被判了刑的犯人相见时都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蓬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拥抱。

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严肃气氛。刑场总指挥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策马跑到他们面前，发出口令：“排成横队！”神甫出现在队列前面，领着由卫兵团团包围的犯人向断头台走去。

生命也许只剩下10分钟或20分钟了吧？

犯人们踏着结冰的台阶登上断头台。“举枪！”只听哗啦一声，枪支全部向上举起，响起一阵急促的

击鼓声。检察长拿着一张纸走上木台，开始用刺耳的尖噪音宣读最高当局的判决了。宣读完毕以后，检察长慢吞吞走下木台。囚犯们跪下，刽子手把钢剑在他们头顶上折成两截，在寒冷的空气中发出干巴巴的破裂声。神甫诵读最后一道训诫，并让他们吻十字架。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这样描写一位死刑犯临刑前的心理活动：“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光。他记得，他当时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那个圆顶和闪耀在圆顶上的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

只剩最后一项仪式了：死前更衣。有人给他们换上了带有尖顶风帽，长袖的又宽又大的白布殓衣。他们被重新整队，三人一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排。第一排里有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神态安详，只是眼睛瞪得特别大。他仿佛是越过一切向高处眺望，平静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死亡。三个犯人绑在行刑柱上，其他每个判处死刑者的前面，并排站着16名射手。装弹药的口令发出了，三个临刑犯人的帽子被拉到眼睛上，但彼得拉舍夫斯基把它甩开了，他说：“我不怕正视死亡！……”“瞄准！”全排士兵举起了枪，瞄准犯人……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开枪？

广场上传来侍从武官纵马奔驰的声音。他把一封密封公文交给苏马罗科夫将军。

16枝枪向上举起，刑柱周围一片忙碌，闭眼等死的犯人被松了绑。检察长开始宣读新的判决：被判死刑的人们或被剥夺公民权，或服苦役，或发配。随后，谢苗诺夫校场响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以后将闻名遐迩的名字：

“ 退职中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西伯利亚要塞服苦役四年，尔后贬为普通一兵。”

犯人中只有彼得拉舍夫斯基直接从刑场解往西伯利亚。他拖着脚镣和同志们一一话别：“朋友们，不要悲伤。就让他们给我们戴上这铁镣好啦！……这是一副珍贵的项链，它是由西方的智慧和正在传播开去的时代精神给我们锻造成的，我们戴上的是对人类隆重的爱……”

刑场这一幕的总导演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但是事先这些“演员”们——判死刑的犯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在玩一个游戏，所以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将他们摧残到什么程度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他当时脑子里像一个万花筒，人生的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电般闪过。他后来给哥哥写信说：“要知道，我今天曾在死神那儿呆了45分钟！我就是怀着

这个想法活过来的，我经历了最后时刻，现在又复活了。”“我的天哪！我创造出来的许许多多已经站稳脚跟的形象，将重新在我的头脑中死亡、消逝，或者化为毒汁随着血液流淌出去！是的，倘若不让我写作，我会死去的。我宁愿握着这枝秃笔再蹲上15年监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哥哥！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失掉希望，我会保持我的这种心灵和精神的纯洁。”这些杂乱无章的自述，听起来就像贝多芬那句不朽的遗言：“经过痛苦达到欢乐！”

在彼得堡圣诞前夕的欢乐气氛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被解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零下40度的严寒冻得他连心都快要冷却了。在途中一个羁押站发生了一件让他永远难忘的事情：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来探望这些“政治犯”，这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而又高尚的俄罗斯妇女，跟随她们的丈夫或情人来西伯利亚受苦受难，几十年的流放生活没有改变她们乐观的天性，也没有挫败她们顽强的意志，她们代表她们的丈夫来看望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餐，并送给他们一些物品，包括每人一本《圣经》，在书皮切开的小口里，装着一张十卢布的纸币。这本《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都携带着，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写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1850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到达四面围着壕沟和土墙的鄂木斯克要塞。“正当一个人踌躇满志，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的时候，他却被关进了监狱。”30年后作家回忆道。这里是一座真正的“死屋”，囚室里地板腐朽不堪，房顶漏水，屋里生着冒煤烟的火炉，到处是跳蚤、虱子和四条腿的蟑螂，马桶从早放到晚，周围是永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囚犯们脸上都刺着字，他们的脊背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里残留着木片。他们随时随地都披枷戴锁：洗澡时戴着，演出时戴着，因病住院时也带着。而且囚犯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从走私犯和伪造货币者到残杀婴儿的凶手和拦路抢劫犯，许多是真正的歹徒，当然其中也不乏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包括英勇果敢的爱国者和无所畏惧的游击战士，其中有一些天赋雄厚的卓越人物。关于服役期间所遇到的人和事，关于他在这期间所经历的生活，在60年代初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死屋手记》中将有惊心动魄的描写。

苦役生活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信念，最初的转变恐怕来自于1849年的死刑仪式，他在那天给长兄米哈伊尔写道：“那个曾经进行过创造并以艺术的最高生命为唯一志趣的头脑，那个曾经意识到并已习惯于关注精神的最高需求的头脑，已被人从

我的肩头砍去。”他已流露出信仰的危机，开始同年轻时代的信念诀别，他曾相信人类能够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相信艺术家生存的最高意义乃在于号召并引导同时代人去改造世界，追求真理和正义。但过去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精神上的孤独使他能重温过去的生活，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他开始放弃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以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的宗教观念以及他们所信奉的东正教为打开通向人民根基的唯一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宗教信仰，实际上他已不信教并持怀疑态度，只不过对基督教怀有哲学上的兴趣而已。这是造成他作品中复杂的思想的根源。

到1854年1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役期满，2月，他永远地离开了鄂木斯克监狱，被编入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列兵。铁镣当啷落地的那一刻，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

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一个座落在吉尔吉斯草原上离中国边界很近的偏僻小城镇，在这里当一名士兵当然要比做苦役犯不知好过多少倍。虽然不太自由，但他重又得到了那些被无情剥夺的权利——阅读和写作。秋天开始，他的处境有进一步的改善。因为最高检察官亚·叶·弗兰格尔来到这里任职，他以前参加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刑仪式，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到任的第二天，就邀请他去一趟他那儿。从此，和省检察

官的私谊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出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上流社会，结交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着对生活的渴望来到塞镇后的第一个年头，他终于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充满整个身心的爱情，这种爱情使他焦虑不安，又给予他难忘的机会，使他体会到生活的无限充实：“至少我也是生活过的，尽管尝到了不少苦头，但毕竟是生活过的。”是的，也许到晚年，他也可以拟定和司汤达同样的墓志铭：“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了。

他爱上了地位低下的税务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的妻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是一位内心充满痛苦又易于冲动、风度优雅又热情洋溢、年轻漂亮的女人，因为丈夫是个酒鬼且不务正业，因此家里一贫如洗。她自己患有肺结核病，但她狂热地眷恋生活中的欢乐和诱人之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活泼而又敏感。正是这些气质吸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正常而且使双方都痛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许并不是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对他有一种同情和怜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全身心地投入热恋之中，并产生一种嫉妒心理，总是怀疑她是否真心爱他，后来伊萨耶夫调到别处，全家迁往该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悲观绝望到极点，以至分别时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经常从千里之外写信来，抱怨丈夫的可悲处境和前途的渺茫，她的来信总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不堪。1855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她的来信中获悉她的丈夫已经去世，而她和孩子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得知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去安排她的生活。他向弗美格尔借了一笔钱，试图把8岁的萨沙安排在中等军事学校念书，甚至打算替自己的情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库兹涅茨克县的情人韦尔古诺夫谋一个职位。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皇帝陛下的侍卫长写了一封便函(这位侍卫长是一个战斗英雄，弗美格尔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一位同学的哥哥)，请求他帮助自己并恢复他的写作权利。不久，西伯利亚西部总督就接到陆军总部关于晋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陆军准尉的命令，费奥多尔终于具备了赢得爱情的条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投向了这一边。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亚在库兹涅茨克举行了婚礼。

婚礼很简单，结婚仪式的参加者是四位证婚人，其中一位是韦尔古诺夫。婚礼进行的时候，新娘不是紧靠着新郎，而是紧靠着情人站着，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他那失败的情敌真的会做出什么举动来，若干年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白痴》那个著名的

结尾即梅什金公爵的婚礼时，大概他自己婚礼的那一幕也深深印在脑海里吧。他认为这次恋爱使他受到的刺激比死亡还强烈。这场婚姻确实有着潜在的悲剧性。比如有些流言蜚语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结婚前夜还和情人在一起，而他们迁居时，情人就尾随其后，仅隔着一站的路程等等。好在结婚以后他慢慢恢复了写作权利，也就不大去注意家庭生活中难以预料的伤心事了。

第五章 历尽磨难话艰辛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退職，并有权居住在除首都以外的任何地方，有权按一般的规定发表作品。这之前他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是他试图用喜剧体裁进行创作的尝试，但事实证明，他可能更适合创作悲剧。

在特维尔作短暂停留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彼得堡进发。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抛在后边了，作为一个人，公民和艺术家，他获得了新生。旅行者随身带着几本鲜为人知的笔记，这些笔记很快便给他带来了世界性荣誉，这就是《死屋手记》头几章的草稿。

彼得堡在动荡之中，全国都处在一片动荡之中。因为农民改革正经历着一场尖锐的危机。因为沙皇虽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但政府只打算让农民获得人身解放，并不允许他们占有土地。“这是导致饥饿和无家可归的解放”，赫尔岑的《钟声》愤怒地警告说。随着“2月19日法令”的公布，农民起义的浪潮遍及全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无疑一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他对贵族推行的这次改革采取否定态度。整个

俄国处在革命的情势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这种气氛中回到了彼得堡，而且一到彼得堡就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他回来时没有悲观失望，没有颓唐来消沉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感到惊奇。他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火热的文学活动中，似乎想把西伯利亚虚掷的十年时光补回来。

还在1858年，费奥多尔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时报》，当时它的发行量很小，1860年春，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有所扩大，米哈伊尔负责正式的文学和政治述评编辑，费奥多尔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1860年9月，《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声明——这是新的文学流派即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当时一些最迫切的问题的答复。

根基主义纲领是以唯心史观、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依据的。这一切都是对涅克拉索夫主编的进步杂志《现代人》的唯物主义和革命性纲领的明显挑战。在对平民知识分子文学的战斗思想进行攻讦并反对用革命方法对俄国实行改造的同时，根基主义都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式。他们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

沙皇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在农民问题上，根基主义者采取温和的立场。该杂志坚持保守的原则，断言俄国历史上未曾发生过阶级的对抗，有的只是农奴与地主之间的和睦一致。

这些思想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世界观的保守和倒退，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在任何人都看得出沙皇的解放农奴是一场骗局的时候，他居然宣扬阶级调和论，居然向往宗法制的田园生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年流放生活使他改变了许多，他已不复是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华，他在思想探索方面的饱满热情，他那政治家的战斗气质，都使《时报》杂志在他编辑的两年半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它们是真正的文学。它甚至刊载过无产阶级的小说译文：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著的《玛丽·巴顿：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史》。然而杂志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编辑本人的两部作品：《死屋手记》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尽管杂志采取了温和主义的立场，但两部作品无疑是属于解放运动的。

《死屋手记》从1855年左右开始撰写，1860年《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了开头部分。1860年—1862年在《时报》杂志连载。

《死屋手记》描写了苦工监狱令人战栗的苦难生

活。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因犯杀妻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出身贵族，极有学问，人们说他是疯子。他在孤寂中死去，留下一本十年铁窗生活的不连贯的笔记。其实这是作者四年苦役生活的真实写照。监狱里执刑官们一个个都是虐待狂，少校是一个可怕的人。

“监狱里的人都憎恨他，像见了瘟疫似的怕他”，而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把棍子打人当成艺术享受，津津乐道地发明各种各样刑罚。犯人在受罚前通常要恳求执刑官手下留情，中尉总是格外柔和地对他们说他会宽厚仁慈的，可是在执行时，中尉却命令士兵使劲打那些求情的人，然后他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作者借此要说明人的天性能扭曲到什么程度。虽然囚犯中也有一些丧失了人性的江洋大盗，但绝大多数是为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压迫、迫害和专制的抗议才来到这里的。加静是个60多岁的波兰老头儿，他是因为政府鼓励老百姓改信正教，便和另外一些人决定“护教”，放火烧了正教堂，而他被以主谋定罪。西罗特金是一个美貌的青年，他是因为不想当兵把查哨的团长刺死而被判刑的。每个囚犯都有自己的经历，入狱后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在狱中凋萎，有的人入狱后才知道世上竟有这样快乐的生活。有的人认为自己有罪，有的人认为自己有理，还有人故意犯罪，以逃避狱外更加艰难的生活。但精神上的贫困比任何

物质上的痛苦更让人难以忍受，虽然许多人身上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虽然许多人有力量和天才，但还是白白丧失掉了？“在这四垛墙内，白白地埋没了多少青春，徒然地断送了多少伟大的力量，我得把一切话都说出来：这些人是不平凡，也许是我们全体人民里面最有才能最强大的人。可是强大的力量被徒然地断送了，不正常、不合理地永不复返地断送了，谁的错！”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苦役中的许多印象完整而无遗漏地带到彼得堡，用无可指责的、严格的、完美的叙事诗的形式传达给读者。但是苦役在他身上也产生了危害。不相信通过革命可以改善现实的倾向，虽然暂时还隐藏不露，仅仅反映在书信、笔记、忠君保皇的小诗中，但是在他身上已经成熟了，对人的天性的怀疑也加深了。他虽然对罪恶深恶痛绝，可是在如何消除罪恶的问题上他陷入了迷途。他认为那些民间出身的人灵魂里有好的东西，但他们的抗议是徒劳无益的，“反叛”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些在《女房东》、《二重人格》中已表露出来的病态的东西，正在潜滋暗长，但暂时还储存在一个最秘密的角落。回到彼得堡，他接触的是昂扬的情绪，对自由的信心，可是对于在各种集会上朗诵《死屋手记》他感到痛苦，因为青年们的欢呼，在他们看来，是被政治战士的光荣包

围，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他是在欺骗他们，他在内心里已经离开他们的信念很遥远了。

《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已具有过渡的性质。而《丑闻》这篇短篇小说不但用厌世、阴郁的色彩描画“小人物”，而且已经开始对当时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报刊进行攻击，在小说里，长官和属员们是同样丑恶的。

也许为了给《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争回一些荣誉——他曾经对它寄予那么大希望而公众却漠然置之，作者发热病似地赶写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几乎一昼夜要写到三印张纸。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反映是热烈的。

小说写一个寒酸、失意的作家彼得洛维奇在彼得堡的一家店铺里遇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因为同情和好奇，他尾随着老人。老人在路上死了，他打听到老人叫斯密司，他把他的房子租了下来。

彼得洛维奇是个孤儿，由伊赫曼涅夫抚养长大。伊赫曼涅夫是个精明可靠的农业家，替华尔戈夫斯基公爵兼管田产。公爵十分信任他，并把他在彼得堡花天酒地的儿子阿略沙也托他监管。有人诽谤伊赫曼涅夫引诱阿略沙娶自己的女儿娜泰莎为妻，公爵撤消了他管理田产权利，伊赫曼涅夫和他争吵，公爵反诬他侵占了自己一万二千卢布，两家由此打起官司来。

伊赫曼涅夫一家迁居彼得堡。彼得洛维奇和他们相遇了，他爱上了热情、天真的娜泰莎，娜泰莎也喜欢他，全家人都同意这件事。阿略沙避过公爵来伊赫曼涅夫家串门，他也爱上了娜泰莎，娜泰莎也爱上了他，以至一个晚上她离家出走，做了阿略沙的外室。阿略沙是个轻浮无耻的人，经常瞒着娜泰莎和妓女鬼混。他的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逼他和伯爵夫人的继女卡佳结婚，因为这样可以使他增加百万卢布的家产。公爵自己和伯爵夫人鬼混却不愿结婚。公爵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亲自拜访娜泰莎，当着彼得洛维奇的面，请求她同意嫁给自己的儿子，阿略沙原谅了自己的父亲，他顺从父亲去结识卡佳，他又爱上了卡佳。娜泰莎猜破了公爵挑拨离间的诡计，当面揭穿公爵的全部卑劣和奸诈。为了报复，公爵找来彼得洛维奇，用各种无耻下流的语言污辱娜泰莎和伊赫曼涅夫，他乘着酒兴说出了自己置伊赫曼涅夫全家于死地的阴谋，他无耻地讲述他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女子，还眉飞色舞地叙述了他真心爱过的一个姑娘，她给了他无数的钱，他却抛弃了她，她只得要饭过日子。

公爵一次到彼得洛维奇的住所，吓坏了彼得洛维奇救助的小姑娘尼丽，使她得了重病。伊赫曼涅夫的官司打输了，最后一个田庄也失去了。

阿略沙同卡佳以及全家一起到乡下，准备结婚。

娜泰莎被抛弃了，父亲也不宽恕她。尼丽住到伊赫曼涅夫家里，他们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她。尼丽说出了母亲的遭遇：她被一个绅士引诱，离家出奔，被情人掠夺一空后抛弃了，最后她一再恳求父亲宽恕，却还是贫困交加地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这个故事感染了伊赫曼涅夫，他决定原谅女儿，不久，娜泰莎回到家中。

彼得洛维奇的一个朋友是包打听，他终于弄清了尼丽正是公爵的女儿，就是他引诱了她母亲，抢走了她外公的财产。尼丽的母亲还是公爵的正式妻子，但苦于找不到证据。这时，公爵又找到一个15岁的姑娘准备结婚，她是将军的女儿，非常富有。阿略沙和卡佳结了婚，尼丽在伊赫曼涅夫家因病去世。娜泰莎和父母一起离开了彼得堡。

华尔戈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人，事业家、冒险家、野心家无耻之徒的详尽完备的形象。这种人丧失了任何一点良心和人格，是一种兽性的利己主义。他认为“一切都是为我，世界是为我而创造的”，“只有有利可图的时候我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爱自己——这是我所承认的一条规则”，“生活是一种商业勾当……我没有、也不想有理想”，“我喜爱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的赌注。可是，主要的一点，主要的一点是——女

人……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责备。我一切都同意，只要对我有好处……”

反映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社会抗议，正是针对华尔戈夫斯基之流的统治者，针对他们万能的权力，横暴的枷锁而发的，然而如同杰符什金想保护瓦莲卡的名誉一样：抗议的人被可耻地逐出门外。于是，他们只能用倔强的容忍和高傲的蔑视来对待侮辱和损害。以被损害者彼此之爱来溶解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他宣扬一种基督徒式的忍从和受难精神，这不能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

另外，用个人心理学主题来代替社会主题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阿略沙的行为在小说里被解释为可爱、幼稚的表现。阿略沙甚至还会引起读者的怜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而娜泰莎也为他辩护。杜勃罗留波夫把阿略沙称为臭瓢虫，而说故事的人——即彼得罗维奇却把他赞美做天上的安琪儿，从说故事的人的观点看来，读者应该深深地同情阿略沙徘徊于两个少女之间，同情不幸的他这样痛心地忏悔，同情他的真诚、天真和毫无保障。这才奇怪呢，这里没有上流社会仗势欺人的恶霸，却只有自己也被欺凌，因为内心分裂而痛苦的人。而卡佳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娇媚纯洁，聪明慷慨。阿略沙觉得他跟卡佳

在一起会幸福，跟娜泰莎在一起不会幸福，因此，了解儿子性格的公爵倒好像是为了儿子的幸福才尽力撮合阿略沙和卡佳的，倒好像不是为了百万钱财，这才更奇怪呢，而公爵居然为此说出一番公正合理的话来。相反，娜泰莎也很难让读者同情她，她抛弃濒于绝境的双亲，投到仇人那一边去，等于授人以柄，因为当初公爵正是借口这个才弄得他们家破人亡的，可她欣赏的阿略沙不过是个渺小的人，这种爱情有什么价值可言就很难说了，而且她还宣称她要做他的女奴隶，看到他去找妓女她既痛苦又愉快，这怎么让人同情她呢。

《穷人》是善良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成了驯良的人，人道主义被基督的感伤主义代替了，以后作品中排山倒海地发展起来的“地狱般”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已露了端倪。

第六章 漫游欧洲的赌徒和一场恋爱

如同在 40 年代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热衷于参加小组和编辑部的活动。他开始出入于亚·帕·米柳科夫的星期二晚会。米柳科夫是《灯塔》杂志的主编。这个小组中最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尼·尼·斯特拉霍夫，他是《时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读完斯特拉霍夫关于《罪与罚》的论文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他说：“只有您一个人了解我。”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把他称作志同道合者和战友。6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互相冷淡起来，一件无法考证的事情使他们关系彻底破裂。作家死后，斯特拉霍夫曾建议其遗孀委托他写一篇传记，他在那篇回忆录形式的传记里确实作了鲜明深刻、热情洋溢的记述，然而在 1883 年致托尔斯泰的一封信里，他却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凶恶、贪婪、放荡，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这种骚扰不安中度过的，这种骚扰不安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幸者，倘若不是由于他富于同情又非常凶恶和聪明的话，甚至可能使他变成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物。”这封信在 1913 年才得以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对此非常气愤，严厉驳斥了这种看法。不

过斯特拉霍夫为什么发表如此迥然不同的看法已是很难知晓的了，也许他是从作品中的人物得出的结论吧。

1862年彼得堡一场大火烧毁了数千家店铺和房屋，使不计其数的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时报》为此准备了两篇文章，人们纷纷传说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其实文章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但作为编辑，无疑他是知道这件事的，因为文章批驳了对“大学生”和“虚无主义者”的造谣中伤：诬告他们是纵火犯，这种“叛逆立场”立即导致两篇文章受查禁。杂志负责人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召到侦缉委员会去做解释，从此，《时报》杂志的命运急转直下，对它的暗中迫害也开始了。政府正是想利用这次火灾加强反动势力。许多进步杂志如《现代人》等都被勒令停刊，各种组织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人士也被关进监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幻想周游欧洲。童年时代安娜·拉德克里芙的小说就激起他对意大利的朦胧向往。40年代，他幻想和果戈理一样在罗马隐居几年，以便写出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来，然而时乖命蹇，他去了西伯利亚。不过到1862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他匆匆游览了欧洲的许多城市。不是像别人那样按照旅行指南去参观名胜古迹，他只细心观察人并阅读大量报刊。欧洲使他大失所望。

1863年他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描写了欧洲的一些阴暗面和令人感到可怕的现象。按照社会意义来说，这是他最进步的一部作品。因为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的讽刺，充满着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热情。而且他在伦敦拜会了两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赫尔岑和巴枯宁，前者是卓越的作家和政治家，后者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这对于他的文学生涯也具有重要意义，赫尔岑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很天真，头脑也并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他满腔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

《时报》的悲剧命运终于成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了。1863年5月末，沙皇政府突然勒令《时报》永远停刊，指责它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刊物，“玷污了民族感情”。原来灾祸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1863年波兰起义要求恢复波兰国，但遭到俄国军队残酷镇压。俄国国内只有俄国革命思想界公开支持起义者，赫尔岑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波兰辩护，《钟声》发出号召：“我们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国自由。”

《时报》一直对这件事表示沉默，后来才委托斯特拉霍夫写一篇政论文章，而在此以前，斯特拉霍夫从未就国际问题发表过评论，他本想以评论民族文化问题代替战争的具体事实，并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题目

《一个不详的问题》，他宣称不应用武力去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而应对两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进行比较，只有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胜利时，俄国才称得上是胜利的一方。《莫斯科新闻》愤怒地指责《时报》杂志对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未采取正确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了一篇长文答复报纸的责难，竭力为刊物辩护，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沙皇，于是刊物遭到了停刊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杂志辩护的同时指责斯特拉霍夫不应过分注意措词反而导致人们从反面理解他的意思，赫尔岑却赞扬《时报》“就波兰问题说了几句人道主义的话。”

这件事没有再追究下去，1864年1月末，经最高当局认可，米哈伊尔获准出版《时代》杂志。人们预料《时报》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恢复，但这种期望落空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强烈的一次恋爱发生在60年代初。他爱上一位年轻的姑娘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在这个非常缺乏生活经验，天真烂漫、兴致勃勃的年轻姑娘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英雄和受难者。他朗诵《死屋手记》时他的整个形象高大起来，他以自己的苦难和荣誉把她弄得目眩神迷，使她对他顶礼膜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她开辟了文学活动的场所，把她的习作与自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刊登

在一起。

然而时过不久，他们的关系出现裂痕。反抗情绪在阿·苏斯洛娃心中苏醒了，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迷恋不过是为了暂时享受一下肉体的欢乐。而她一度把他看作理想的化身。他们的矛盾还因为社会纲领的不同，苏斯洛娃 16 岁时就气势汹汹地宣称要否定“旧世界”以及旧社会的艺术、宗教、民族文化、唯心主义伦理，而这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珍视的。

1863 年冬或翌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约请他这位高傲的女友和他去意大利度夏。但他因为刊物的繁杂事物一直滞留俄国，苏斯洛娃对于他们共同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已经厌倦，遂于夏初先行去了巴黎。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望着倒映在叶卡捷琳娜运河水面上的煤汽灯喷嘴的暗淡影子，想到他生活中仅剩下的一点最美好的东西——阿波利纳里娅的爱情，他再也无法忍受分离的痛苦，于 8 月中旬离开彼得堡。

终于到了巴黎！他从旅馆匆匆寄了封短笺给苏斯洛娃，没等收到回音，他就去找她了。然而见面是难堪、痛苦的。“我并没有等你，我的信你难道没有收到吗？”信第二天才收到，他知道已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

“你幸福吗？幸福吗？你只需对我说一句话：你幸福吗？”他一直跪在那儿不起来。

一声几乎难以听见的回答：“不。”

“怎么会这样？你爱着，却又感到不幸福？这难道可能吗？”

“他并不爱我。”

等她稍微平静下来以后，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叫萨尔瓦多，医学院的学生，一个讲究穿戴的美男子，他的亲属是一个采金者、航海家、掠夺者和殖民者的著名家族。她疯狂地爱上了萨尔瓦多，但他欺骗了她，认为自己无须承担任何义务，竭力回避和她见面，想跟她一刀两断。自从那天在街上偶然相遇，他冷冷地作了几句解释以后，被抛弃的女子便下定决心：或者把他杀死，或者自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担当起无私的安慰者、毫无用处的“第三者”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朋友这一类的角色了，他劝她为了那个负心人而戕害自己是毫无意义的，她也赞成他的意见。有一天她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参观革命伟人祠后的一座带祭廊的中世纪建筑物。

“不久前，在这座小教堂里，我向神甫忏悔过一项罪恶的计划。”

他打了一个寒颤。

“你忏悔了什么？什么？”

于是，她向他供出了自己的一项秘密计划，她产生了可怕的杀人念头，这种念头完全把她控制住了。

“到底是什么？杀死萨尔瓦多？”

“不，不是他。”

“不是他？是谁？也许是我？”

“哦，不是！”她随随便便地说：“我告诉你吧，这是一项宏伟而又非同寻常的计划。……”

她说她要使复仇变成一桩伟大的壮举，以自己的牺牲去博取不朽的名声，她要为被玷污的爱情复仇，这样一来她就会被载入人类的史册。

“你究竟想杀谁？”他惊恐万状地说，已预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

“为了我所蒙受的侮辱，让随便哪个男人付出代价还不是一样？你们所有的男人都有罪；你们全都问心有愧：欺骗女人，忘恩负义，贪淫好色。既要报仇雪恨，就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次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复仇……”

“波利娅，你冷静些，难道你要杀人？”

“我决心已定。”

“杀谁？”

她用深沉的，几乎是轻蔑的眼光看他一眼。

“难道你猜不着？就是沙皇！”

他浑身哆嗦了一下。1849年的那一幕一闪而过。

“你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许有这种想法。”

“不，我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她放弃了那种想法是因为神甫不耐烦的态度，是因为他说亚历山大皇帝是一位理想国君，是个好人。她的动机是那么幼稚简单，放弃又是那么可笑荒唐。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脑际，使他不得安宁，“精神上的弑父”在他早期生活中就有接触，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将体现出来。

9月初，他们离开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呆了四天，很想轮盘赌场上赢一大笔钱，结果他输了3000法郎，需要从俄国汇寄100卢布才能继续旅行。在日内瓦他拿出最后250法郎去赌，结果全输了。为了到都灵去，他当了怀表，苏斯洛娃当了戒指。

到了闷热的都灵后，两位旅行者已身无分文，只好坐等彼得堡汇寄的100卢布。那种等钱的凄苦状况，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都灵是一座最可恶的城市，但在这座枯燥乏味的城市里，他和苏斯洛娃言归于好了。

后来他们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最后到达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抑制不住对轮盘赌的迷恋，便动身到洪堡去了。苏斯洛娃对这种旅行意兴索然，就回到了巴黎，几天后她收到费奥多尔的信，说他又赌输了，

请求她寄点钱去，她借了熟人 300 法郎给他寄去。他们这一次几乎是永远分手，虽然以后还有一些交往。后来阿波利纳里娅的丈夫问他们为什么断绝来往，苏斯洛娃告诉他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和妻子离婚，他妻子那时已是肺病晚期了。苏斯洛娃是个求全责备的人，爱走极端，喜欢追求强烈感受，傲世轻人，感情用事，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罪与罚》里的冬尼娅，《白痴》中的娜阿泰谢时，恐怕也有他这位情人的影子。

和阿·苏斯洛娃一同漫游欧洲，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秀中篇小说之一《赌徒》提供了素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篇小说的构思并不是在 1863 年产生的，而是更早。1859 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费奥多尔曾读到一篇题为《一个赌徒的手记》的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文章。那是一篇描写外国轮盘赌场风习的随笔，同时也是一篇描写一个热衷于在欧洲公共赌场上冒险碰运气的赌徒的个人悲剧的短篇小说。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里面提到有人找到一种能保证只赢不输的可靠方法。于是他读了上百篇描写轮盘赌的文章。从那以后，他便幻想在夜间把赌台上庄家的钱赢光。他觉得他已掌握了赢钱的秘诀：沉着冷静，赌注下得要小，千万不可孤注一掷。15 年后在《少年》中他写道：“直到

现在我仍确信，在赌博时，只要沉着冷静，使头脑充分保持清醒，就会克服盲目性和粗心大意，就会只赢不输。

不过使作家心醉神迷的不光是对赢钱的追求，而且还有新的文学题材，这种题材充满着激情、斗争和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写出一部奇妙的杰作，这一创作意图是因人类命运的空前转变而引起的，因为现在决定着人类命运的是“单数与双数”、“红点与黑点”、“零”和“十二个前面的数字”。

几乎在整整十年时间里，他成了一个狂热的赌徒。1862年夏初再次出国后，他首先到法国一个著名的公共赌场大赌了一番，并在抵达巴黎前赢了1万法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爱走极端，他在一生中都爱一味冒进。狂热的赌博犹如一种极其危险而且十分有害的诱惑物，以不可抗拒之势迷住了他的心窍。1863年，正当阿·苏斯洛娃在巴黎等候他的时候，他又顺路拐到威斯巴登逗留了几天，幻想能赢它10万法郎，他一次就赢了一万零四百法郎，决心第二天离开赌场，但他未能坚持住，结果把赢来的钱又输掉了半数以上，剩下5000法郎，他把其中一大部分寄回彼得堡，请求转交给身患重病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写信来说他在轮盘赌场上输了个精光，

请求把寄来的钱再寄回去。

长兄米哈伊尔无法掩饰自己的气愤：为什么要把赢来的钱寄回俄国呢，居然在收到的第二天又得寄回去。最主要的：“我简直不明白，当一个人和他钟爱的女人一同旅行时，怎么会去赌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篇描写一个拼命狂赌同时又爱上一个女人的赌徒的中篇小说中，解答了这一复杂的心理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赌博是一种可耻的事，特别是对艺术家而言，因为艺术家需要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费奥多尔是完全站在赌徒一边的，并说过这样的话：主人公的许多感情和感受他都亲身体验过，他要人们相信，尽管他具有坚强的性格，而且可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这一点，他却无法克制自己对轮盘赌的迷醉。

然而悲剧也正好发生在这里。他觉得，莱茵河畔城镇中那些“不祥的轮盘”一开始，仿佛使他跳进一个新的“监狱的澡堂”。他看到的是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充满恶习与罪孽的可怕世界。《赌徒》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一世界。

小说着力描写了波林娜的形象。这位出色的俄国姑娘的性格十分独特，她高傲、大胆、独立不羁、酷爱生活、头脑聪慧而又充满热忱，同时又是一个母老虎和爱折磨人的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是这样理

解阿·苏斯洛娃的。

在小说中，波林娜是一位将军前妻的女儿。母亲死后留在继父家里，充当她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的外语老师。她爱上他们家的家庭教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机智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也狂热地爱上了她。将军则迷上了交际花布朗歇小姐并准备结婚，由于事业彻底失败，在钱财方面不得不依靠年轻的法国高利贷商人德·格里叶，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外出期间，波林娜成了法国人的未婚妻，法国人以其漂亮英俊的外貌迷住了她。德·格里叶很快在热恋他的姑娘面前露出卑鄙而吝啬的本性。当他看到他获得一大笔嫁妆的希望破灭以后，便同她断绝了关系，只从她继父的债务中减去5万法郎，作为对她的馈赠。波林娜受到了侮辱，决心把法国人赠给她的钱还给他。能够拯救她的只有英国豪侠青年阿斯特莱先生。轮盘赌还冷酷无情地威胁着那个地位卑下的家庭教师的命运。为了拯救波林娜，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顾一切地拼命狂赌。他感到命运已被截成两半：“我整个的生命都成了赌注！”

无所畏惧的赌徒赢得了20万法郎的胜利，但可怕的精神崩溃却在暗中等候着他。狂赌、赢钱、黄金——这一切都淹没了他对那位可爱姑娘的无限深情。

“我发誓，我非常疼爱波林娜，可是说也奇怪，

自从我昨天触摸到赌台并开始一包一包地把钱划拉过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爱情就似乎退居到第二位了……我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飘飘然起来。”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游历意大利期间所经历的悲剧。

在这种情况下，波林娜拒绝了她所钟爱的，刚刚为她赢了20万法郎的那个人的资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渝地把小说中的两个基本主题结合在一起：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作用和现代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内在感情的力量。波林娜只爱她的“赌徒”，这种爱是全心全意和坚贞不渝的。

在他们分离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将军家中这位地位卑下的家庭教师完全堕落了。他当过仆人、听差，蹲过债户拘留所，后来不知何人把他从那里保释出来：他靠教俄语混饭吃，拼命地赌，赢过钱，后来又把赢来的钱全部输掉，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也许有朝一日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以一个悬念收尾，对主人公的前途未作任何交待，但正像古希腊罗马悲剧中所描写的那样，主人公注定要遭到毁灭。

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把大把地赢钱的那一天，波林娜患了重病，阿斯特莱先生收留了她，给她延医治疗，并委托自己的亲属好生照看她。他对“赌

徒”说：“如果她死了，您要对我就她的死因作出解释。”时过不久，他把她送到瑞士。她在那儿病了很久，后来又把她送到英国北部地区，让她跟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去世的“祖母”给她留下7000镑财产。不言而喻，波林娜很快就将成为阿斯特莱夫人。但她的心只属于那个穷苦的俄国人，一个才华卓著、心灵崇高的人、不幸的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格外珍贵，就因为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迷上轮盘赌的十年间一幅出色的自画像。

第七章 可怕的 1864 年

人们曾希望陀氏兄弟办的第二个刊物《时代》能和第一个刊物《时报》一样好，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时代》的创办过程，也即它的消亡过程。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死胎，纵使费奥多尔把他做编辑的全部看家本领拿出来，也无法使它和第一个一样出色。原因是政府采取了虚伪的态度，它答应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一个需拟专文呈报批准的刊物，但许可证直到 1 月末才发下来，那时所有的征订工作已经结束。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刊物坚持一种“无可指摘的方向”。对它实行了特别的监督。

由于政府的压力，也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刊物一开始就采取了保守甚至反动的立场，这是它迅速垮台的最主要的原因。杂志发刊辞指出，编辑部打算坚定不移地按照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一个刊物的精神来办这一刊物，并将竭力根据俄罗斯民族的方向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地方自治问题，这是根基主义的继续，不过已带有右翼斯拉夫派的倾向。它强烈谴责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揭露，否定社会批评，反对政治讽刺。应当拥护俄国自身的历史，防止西方那种“洗刷一切的

文明”的渗透。不应陷入抽象的议论和盲目崇信外国的东西(即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切都加强了《时代》的保守主义倾向，使人们无法就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现象提出鲜明的、新颖的、生气勃勃的见解。它同著名的进步杂志《现代人》展开公开论战，虽然当时有一些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为其撰稿，但由于它坚持了一个错误的纲领，终于免不了“寿终正寝”的命运，只勉强维持了一年，出刊第十三期就再也支撑不下去，结束了它那短暂的生命。

刊物的立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观点是分不开的，1864年是他一生中可怕的一年，这不仅由于刊物的命运、家庭的变故等原因，还因为这一年是他世界观彻底转变的一年。他开始维护反动势力，反对当代的进步运动。哪怕最伟大的作家，如若采取这种立场，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几乎是他坎坷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保持着他的创作才华，但作为战士和思想家，他却被历史的风暴吹到反动势力那一边去了。天才的小说家把他的时代摧跨了，他已不能沿着赫尔岑、海涅、雨果的自由道路勇敢前进了。沙皇制度牢牢抓住他不放，阻碍了他青年时代酷爱自由的幻想的继续发展，迫使他屈服于自己的钢铁意志，使这一朝气蓬勃的创造力量脱离了行将到来的崭新世界的文学。

这一切都是从他新小说《地下室手记》开始。
《时代》第一期刊登了该小说的开端部分，作家似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将他 20 年来郁结心中的怀疑主义通通倒出来。

《地下室手记》是他写得最露骨的作品之一，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如此直言不讳地揭露心中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他以鄙夷不屑和嘲讽的态度彻底否定了他同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接近年代所尊崇的一切。他似乎想把自己在服苦役期间所经受的磨难都归咎于这两位青年时代的精神领袖，并对他们加以侮辱、谴责和抨击。作者年轻时曾热烈向往和迷恋过的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被视为这样一种美好而崇高的东西，它们在 40 年的时间里一直死死地挤压着他的后脑勺，他以嘲讽的口吻把空想社会主义的首领称为“人类的宠儿”，把他们的学说称作“幸福的体系”，硬说那种学说是跟人心中不可遏制的放纵本能以及与生俱来的独立性相对立。

由于人类这种非理性的天性的存在，要想按照事先设想好的一套计划来安排人类的生活，这是永远不可能的。针对傅立叶主义的乌托邦理论，作家宣称人的欲望应有无限的自由，人的破坏热情和恣意妄为是

合法的，一切个人主义的刁钻行为、独断专行和具有破坏性的古怪念头都是不可侵犯的。

构思这篇小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革命民主主义者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来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根基主义者则珍视人的内心修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上的磨难，人的生活不能单靠理智来调整，此外还有感情，还有愿望。地下室的人不会接受将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分类法，他们不会珍视这种功利主义，他们认为“自由的意愿”即“最高的利益”，要比功利主义好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怎么办》所作的尖锐而激烈的攻击，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他放弃40年代人道主义的结果。他现在竭力捍卫极端的个人主义，把个人意志同世界历史对立起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秋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现实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论战，以地下室那位“爱发怪论者”同一位“妓女”的邂逅相遇而结束。涅克拉索夫曾向那些被遗弃的少女发出过光明正大的召唤：

请大胆地、自由地走进我家，
做一位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离群索居，城府很深，尖酸刻薄的思想家，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进步人士”，在他看来，那些进步人士之所以能显身扬名，似乎是依仗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学原理，地下室的人认为这纯属谎言和欺骗。

离群索居的生活导致了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称为非主人公的人物疑虑不断增加，心肠更加冷酷。

“我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是不会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的！”这个丧失了享受人间普遍幸福权利的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不幸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他同任何的英勇精神、人道主义、诚实正直、利他主义以及构成生活的坚实基础的一切东西都是格格不入的。

小说中还有一位女主人公，名叫丽莎，她同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事物”也是相对立的。她属于所有的人，却爱上了其中一个，尽管那是一个最不值得爱的人。正是这一点拯救了她，使她走上“充满生气”的生活，使她满怀憧憬，向往美好的事物，向往家庭的幸福。而那个刚刚受到众人侮辱的“爱发怪论者”，把自己的满腹委屈都发泄在她身上。他以清白无辜的生活和做母亲的幸福这样一幅图画来从精神上去折磨她，因为她从事的那种职业使她永远无法得到这些东

西。他以一种不容反驳的说服力向她描绘了等待着她的命运——从一个卖淫窟转到另一个更糟糕的卖淫窟，甚至转到干草市场上的地窖，在那里等待她的是花柳病，鸨母的殴打和勒索，严重的肺结核，甚至还有死亡和水牢……听了这些话以后，她不禁号啕痛哭起来。毫无恻隐之心的讲故事者慌了手脚，感到很不好意思。

几天以后，她怀着对清白生活的向往来到他的住处，并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衷曲：“我想……永远离开……那里。”

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多愁善感的滑稽剧，因而使他怒不可遏，“地下室生活”完全吸引住了他，于是他气急败坏地痛斥那位不幸少女的善良愿望。

丽莎没有听从他的话，忿然离去，从而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只是当她走了以后，他才发现桌上放着一张她扔下的皱巴巴的蓝色钞票，这“正是一分钟以前他塞到她手里的那张钞票”，他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永远切断她走上新生活的道路，使她不再对贞洁、新生、人道、爱情抱有任何希望。

《地下室手记》是《罪与罚》的草图，《罪与罚》在很多重要方面深化和扩展了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给阿波降·格里戈耶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你就按

照这种风格写下去吧！”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长篇小说都采取了这种结构法：既充满尖锐的思想冲突，又充满悲剧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巧妙地把音乐上从一个调转入另一个调的规则应用于作品的结构，这部小说就是根据音乐上的对位法原理写成的，第二章所描写的街头妓女的痛苦心理，是与第一章中折磨她的那个人所蒙受的侮辱相一致的。与此同时，按非一致性来说，她的痛苦心理又是与他那受到戕害的并变得凶狠起来的自尊心相对立的，这就是对位法，这就是用不同方法表示同一主题的多声部，这就是表现各式各样的生活以及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位法，即对立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曲家之一米·伊·格林卡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自从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迁居彼得堡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肺病就开始一天天恶化了。作为一个体弱多病并且贫穷的亲属，她神经过敏地觉得全家人对她很不友好，她立即对他们采取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并把自己的全部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她一直认为夫兄米哈伊尔是一个隐秘的敌人，直到临终前才表示愿意跟他言归于好。她丈夫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对他的事概不过问。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病在西伯利亚干燥的条件下发展得还比较缓慢，来到潮湿的彼得堡后，病情急剧恶化，发展成很厉害的肺病，她辗转各地治疗，终无效果。到了晚期，病人的精神状态完全失常了：她常常发生可怕的幻觉。有时候突然小声喊叫起来：“有鬼，有鬼！”只是在丈夫当着她的面把通风小窗打开来，象征性地把鬼驱逐出去以后，病人才平静下来。

到了春天，结核病患者的病情加重，1845年4月15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与世长辞。这对夫妇彼此深爱着对方，却又从未过过幸福的生活，但愈是不幸，他们却愈是互相依恋。4月16日，面对着妻子已经冷却的尸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意义以及人生在世的使命的某些沉思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这笔记包含着许多神秘主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故去的妻子怀有深挚的爱，她的死使他经受了一场悲剧。

她曾激励作家创作出他那部最伟大的作品。一年半以后，在《罪与罚》中，通过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马美拉多娃的形象，他举行了一次创作上的死后祭奠，以纪念他的第一位生活伴侣。在对现实生活素材作通常的艺术加工时，他通过马美拉多娃那位饱尝辛酸的女伴的生活际遇和个性，再现了自己第一位妻

子生活阅历中的许多细节。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同一个酒鬼的结合，“极度的贫困”，可怕的肺结核，满腹的怨恨和滔滔不绝的忏悔的眼泪——卡捷林娜·伊万诺夫娜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根据自己亲人的个性加以描写的，甚至女主人公的外貌也是这样。

所谓“祸不单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经历证明这句谚语是对的，特别是1864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未来得及安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的长兄米哈伊尔又患了重病。

长兄的病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恶化的，开始时他并不在意，继续伏案工作，后来病情日趋恶化，这才引起全家人的焦虑不安，6月，医生警告说病情有危险，但新生刊物的主编仍不愿停止工作。7月10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了。

在费奥多尔所有的亲属中，长兄是他最感亲近的一个，是他的主要助手和战友，虽然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米哈伊尔在青少年时代迷恋过诗歌，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想法很快就让家庭重担给挤垮了，他放弃了心爱的抒情诗，转而靠卖文为生，成了彼得堡几家刊物的小说和批评栏的撰稿人。

米哈伊尔终其一生是个沉着冷静，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人。他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但从未在讨论会上发过言。那个著名的案件发生时他

也被捕了，但很快就释放了。有传闻说之兄弟中有一人在审理过程中出卖了自己的兄弟，从而使自己安全脱险，这个人当然不是费奥多尔，因他已被判服苦役，也不可能是费奥多尔的弟弟安德烈，因为他和小组没有任何联系。只有米哈伊尔被释放而且得到皇室办公厅的奖赏，但究竟是不是米哈伊尔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已经不得而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悼念哥哥的文章《谈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对长兄给予高度评价，充满溢美之辞。其实他描述长兄的特点应是他自己的特点。《时代》和《时报》杂志的真正编辑和方针制定人是他自己，而他哥哥不过负责行政和营业方面的事务。米哈伊尔也许还算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因为他曾成功地把《强盗》、《唐·卡洛斯》、《列那派的故事》翻译成俄文。

长兄去世后，全家人孤苦无靠，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还有二万五千卢布的债务需要偿还。为了挽救已故长兄的名誉和偿清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继续出版《时代》这份大型刊物，并想以自己的顽强的意志和紧张的工作把它办成俄国最出色的定期刊物之一（前文已经说过了，他最终没有成功）。

在这个困难时刻，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决心以勤奋的写作来支持这位编辑。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就是

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身上充满真正的创作灵感和大胆的美学革新精神，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年龄上相差无几，都经历过同样的思想变化，他们在理性上的成熟和发展程度颇为相似，所喜爱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也大致相同，因此他们俩是很接近的朋友。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全力以赴地为《时代》写作，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篇关于俄国戏剧的文章，两封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信，标题是《有机批评的奇思妙想》，另外，他还为他那部论述当代艺术创作思潮、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卓越回忆录《我在文学上和精神上的漂泊》补写了一些新篇章。

1864年7月，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再次被送进债户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他仍试图继续为《时代》写文章。但囚禁生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病倒了，苦闷得几乎“发了疯”。

8月21日，费奥多尔前去探望他，格里戈里耶夫请求他把自己保释出来，为此大约需要100卢布。几天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后者给他寄点稿酬去，因为他的衣服已破旧不堪，他需要给裁缝15至20卢布，然后才有可能出门上街。

9月2日，他对自己20年来的文学活动作了令人不胜悲伤的总结：写了一篇题为《留给我的新朋旧

友作纪念的简历表》的文章。这种生平自述既像遗嘱，又像诀别词，这位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诡辩哲学家和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就这样退出了文坛和生活。9月20日他被一位不肯披露姓名的女士保释出来。由于一次意外打击，几天以后，他溘然长逝。

后来有一位将军夫人为了给那天参加葬礼的人消愁解闷，就说格里戈里耶夫是她保释出来的，因为他曾使她有幸为他翻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提供演出费，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都说明当时俄国作家地位的卑下与贫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接受过他这位朋友的许多思想。不过这位批评家和诗人之所以使他感到亲近，还由于他的个性，他的典型性和他的才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这种落拓不羁和富有人生乐趣的，充满感召力和创造精神的襟怀坦荡的俄罗斯性格，他在塑造那些纵欲无度的俄国人的形象时，大概经常联想起这位诗人、思想家、批评家和哲学家的性格。那些俄国人的形象，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米卡·卡拉马佐夫那种激情满怀、热情奋发、充满热忱与灵感的性格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半年之内三个亲人的死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孤寂。

1864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时间

虽短，却极不寻常的恋爱史。一位与他萍水相逢的默默无闻女子的独特个性和不平凡遭遇，把他完全吸引住了。

这位女子名叫玛尔法·布劳恩，出身小市民阶层，文化修养较高，颇有才华。她通晓英语，性格坚毅果敢，文笔生动流畅，“我一向认为，生命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感受。”50年代末，她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孤注一掷，乘坐一条移民船漂泊到异国他乡，在一群吵吵嚷嚷的外国冒险家、猎奇者和各种商人中间厮混。她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流落到另一个城市，还一度到过奥地利。

1862年返回祖国后，她的悲惨境遇更是每况愈下，她过着孤独无依的生活，她和两位文学家同居过，但是这些作家都很贫苦，连她以前认识的流浪汉都不如。

后来她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尽量在物质上帮助她，并吸引她从事文学工作。他们经常通信，她向他断断续续地叙述了她的激动人心的经历。他还去医院看望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的谈话，尽管玛尔法对他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但由于她和那位文学家的同居关系，她没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交往下去，他们的关系是纯洁高尚的。如果处在另一种环境

下，玛尔法·布劳恩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说一句话：“要想文章写得好，就得受苦，再受苦！”而玛尔法阅历丰富、思维敏捷、遣词造句确切恰当。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她终究没成为一个像乔治·桑那样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地方也未提到她。但她的影子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曾和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姐妹有一段感情纠葛。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了才华横溢、美丽高傲的姐姐安娜，而他自己却成了14岁的妹妹索菲娅暗恋的对象。但安娜终于没有嫁给神经过敏而又求全责备的作家，她后来成了一个法国革命家的妻子，巴黎公社期间，她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经常登台演讲，发表文章或在医院里当护士。而妹妹索菲娅也没嫁给作家，她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俄国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院通讯院士。

交织着爱与悲痛的1864年就这样过去了。

第八章 《罪与罚》

1866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些具有转折意义，包括《罪与罚》的写作。

《罪与罚》的最初构思可以追溯到50年代，小说家对中心人物形象酝酿了大约15年。早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给长兄写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曾对你讲过一部忏悔录式的长篇小说……我将把我的全部心血倾注在这部小说上。早在服苦役期间，当我躺在通铺上，愁肠百结，发生思想裂变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它了……这部忏悔录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散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和笔记中的一些记载均证明，他所说的《忏悔录》就是指拉斯柯尼科夫的故事。

在服苦役期间，在那些被抛弃的人们中间，他对人的个性有了新的理解。他周围那些杀人犯完整的内心世界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使他感到吃惊。“看来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苦役犯奥尔洛夫曾这样描写道，“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也藐视一切苦难和惩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到畏惧。在

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

作家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一个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有权犯罪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现代个人主义者和否认道德规范的英雄人物形象，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干任何事情，尽快地攫取权力，大发横财，行凶杀人的想法在他身上已经成熟。

《茨冈》是普希金长诗中最酷爱自由的一部，在这部长诗中，特别有力地响彻着诗人对当时专制国家的奴役制度的抗议。阿乐哥的行凶杀人和被人抛弃，是拉斯柯尼科夫行凶杀人和孤独生活的主要根源之一。

“阿乐哥杀了人……他意识到他本人配不上他自己的最高理想，那种理想折磨着他的心。这就是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无限度地追求自由解放，不可遏制的反抗意向，导致普希金的主人公在残酷报复和行凶杀人之后精神彻底崩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就是犯罪与报应的悲剧事实，这种悲剧也把他笔下的拉斯柯尼科夫给毁了。

1860年在阅读法国刑事案件汇编时，一篇题为《拉赛内尔诉讼案》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皮埃尔-弗朗索瓦·拉赛内尔是里昂市一个商贾的儿子。他面孔清瘦，风度优雅，嘴角上总是挂一丝嘲讽的微笑，他曾想埋头于研究法律。1829年，在一次决

斗中，他杀死了著名政治演说家邦雅门·孔斯坦的儿子。这次决斗结束了拉赛内尔生活中的第一幕，并成了他尔后与一些性格罕见的特殊人物呼朋引类，互相勾结的起因。

从狱中释放出来以后，他打算从事文学活动——写诗。但文学活动也不能使拉赛内尔感到满足；他又跟那些狱友们来往。由于饥饿，由于对金钱和享乐怀有无法遏制的欲望，他开始参与他们的盗窃活动。时过不久，他决心干更大的犯罪勾当：行凶杀人，抢劫财物。在蹲监狱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他在一大群作家、法学家和医生们面前，尽情地发挥他关于文学、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他那精辟的见解，清晰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使所有的听众惊诧不已。

这类喜欢发表抽象议论的罪犯或满口空洞理论的杀人凶手，以其心理上的各种矛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在他看来，若能对这类人物加以浪漫主义的体现，是会大有成效的。

艰难困苦、严峻可怕的1864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艺术构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长兄死后，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困境，他像发热病似地到处寻求资金，他经常在各种借据上签字，偿还债务，他随时都有被关进债户监狱的危险，他不得不经常同区警察所所长，彼得堡的高利贷者，各种各样代理人和生意人

打交道。

在物质状况极端恶劣的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他那位年迈的莫斯科姑妈库马宁娜借过 1 万卢布的债。作家在自己家中也十分真切地感觉到了拉斯柯尼科夫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孤苦无靠的年轻生命，已故长兄的孩子们，另一方面是一位年迈昏聩的老太婆，她掌握着库马宁家不可胜数的资本，并立下遗嘱要捐献一大笔钱给教堂，以备将来超度她的灵魂——这与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极为相似。

沉闷的、令人讨厌的、充满恶臭味的彼得堡夏天，正好符合他的心情，甚至还赋予他写作的一些虚假的灵感。

故事发生在彼得堡 S 街一家公寓里，年轻英俊的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因无力交付学费而不得不放弃学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早已去世，母亲领着妹妹节衣缩食，苦度岁月，将积攒下的钱寄给儿子。尽管这样，拉斯柯尼科夫仍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

距他住所不远的四层楼上住着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此人心肠歹毒，爱财如命。去年冬天，拉斯柯尼科夫结识的一个大学生曾告诉他如果缺钱用，可以去她那里当东西。一个半月前他想起他有两件东西可当：父亲的怀表和妹妹送给他的戒

指，他决定先当戒指，当他找到那个老太婆的时候，便对她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憎恶。老太婆只付给他两个卢布。他很不痛快地离开了，去到一家小酒馆。他坐下沉思的时候，一个奇异的想法像蛋壳里的小鸡一样啄着他的头脑，无法摆脱——他决定把她杀掉。

几乎就在他身边的桌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军官，大学生向军官提到那个老太婆，说她如何狠毒、怪僻、贪婪，并说她如何虐待与盘剥同父异母的妹妹理萨威泰，最后说：“我倒想杀死那个该死的老太婆，抢来她的钱，管保没有一点良心的责备。杀死她，拿她的钱为多数人服务，为全体谋利益，难道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桩小罪抹去吗？牺牲一条性命，成千上万的人便可以免于败坏毒烂。一死换百生——这是简单的算数……当然我不肯杀她，我只是想说明那件事的正当，那与我毫不相干。

拉斯柯尼科夫大为震惊，这场普通的谈话在以后事态的发展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半月后，拉斯柯尼科夫拿了怀表去要求抵押，老太婆只肯给一个半卢布，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当老太婆取钱的时候，他注意观察了她拿钥匙开钱柜的情景，然后走时他告诉她还要拿一个银烟盒来抵押。

第二天，拉斯柯尼科夫发现老太婆的妹妹正跟一个小商贩谈话，并说明晚7点到这里来。也就是说，

明晚 7 点只有老太婆一个人在家了。拉斯柯尼科夫由惊奇渐渐变成了一阵恐怖，好像一阵寒战从背脊传了下去。事情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次日，拉斯柯尼科夫整天闷在家里，头疼，不思饮食，躺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忽然钟声响了，他一跳站了起来，钟已敲过 6 点了，他却准备得不多。他心跳得厉害，拿出伪造的银烟盒，像猫一样溜下楼去。他想到厨房去取斧头可是女房东在那儿做事，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他焦急万分。忽然发现门房的长凳下面有一把斧子闪闪发亮，他取来系在外套里面的活结上，没事一样走出房去。

非常凑巧，他到老太婆住的大楼的时候，正赶上一辆拉草的大车从大门赶进去，他被车挡着，一眨眼就溜了进去。在楼梯上一个人也没遇着，有一家门里有两个漆匠在干活，但谁也没注意他。他直奔四楼，心剧烈地跳着，三次门铃之后，老太婆开了一条门缝，用锐利而多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走进屋去，把典物递给她，老太婆转向窗户的亮光观察，他手一挥，她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倒下去。

他正搜罗老太婆的钱财的时候，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他抓住斧头跑出卧室，只见理萨威泰站在屋中央，茫然地看着被害的姐姐，脸色白纸一样。拉斯柯尼科夫举起斧头，一下把她的额头劈开了。

门铃响了起来，外面人拉了好一会儿，见无声响，一个人就去找看门的，因为他们知道屋里有人，另一个人一会儿也下楼了。拉斯柯尼科夫急忙开门走了出去，当他走到三楼时，一阵大嚷，有几个人上楼来了，正在这个紧急时刻，有一间空屋的门开着，他躲了进去。等那几个人上楼后，他掂着脚下了楼，再没碰到一个人。

行凶之后，拉斯柯尼科夫深深陷入恐怖与烦躁之中，像得了大病一样。第二天，看门人送来传票让他到警察局去一趟，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女房东要他还债，当他签完字准备离开警察局的时候，有几个人正在议论老太婆被杀的案件，他立刻晕倒了。

回到住处以后，他便病了，精神也四分五裂。病好之后，有一天他到街上，看到他以前认识的马尔美多夫被马车撞伤，满身血污，不省人事。马尔美多夫是个酒徒，因酗酒不仅丢掉差事，而且连老婆的袜子也卖掉了，他的妻子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得了严重的肺病，几个孩子忍饥挨饿，全家六口人难以过活，前妻的女儿索尼娅，为了全家活命不得不靠出卖肉体挣钱。

拉斯柯尼科夫协同警察把他送回家去。马尔美多夫苏醒过来后，一眼看见一身街头妓女打扮的索尼娅，

悲痛万分，惊叫一声“女儿呀，宽恕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拉斯柯尼科夫看到这可怜的一家大小，将母亲寄来的25卢布送给了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这天，他认识了索尼娅。

拉斯柯尼科夫回到住处后，发现母亲和妹妹冬妮娅来了。他意识到这是卢仁将她们骗来的。第二天，卢仁又寄来一个便条，企图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说拉斯柯尼科夫把母亲寄来的钱全部给了一个下贱女人。

原来卢仁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早相中冬妮娅，因为娶一个贫寒家庭出身的姑娘会使她老老实实听他驱使。母亲虽答应了这门亲事，却遭到拉斯柯尼科夫的反对，卢仁自然不满。拉斯柯尼科夫说出事情的真相，并在当天晚上当面戳穿了他的谎言。卢仁更加怀恨在心，决心报复。

在马尔美多夫的葬礼上，卢仁来了。他诬陷索尼娅偷了他100卢布的钞票，企图以此证明她的贫穷下贱，从而说明拉斯柯尼科夫送给她钱是真实的。索尼娅有口难辩。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从她身上搜出100卢布。卢仁更加得意。这时列别兹雅特尼科夫揭穿了卢仁的栽赃阴谋，因为他清楚看见是卢仁偷偷将钱放进她口袋里的。拉斯柯尼科夫挺身而出，指出卢仁的卑鄙目的，索尼娅非常感激同情他。

就在这天晚上，拉斯柯尼科夫向索尼娅讲了他犯

罪的动机：如果让卢仁阴谋得逞，索尼娅就会被当作窃贼关进监狱，她们一家再也活不下去了。他让索尼娅回答，是让卢仁活着为非作歹，她们一家走向死亡线，还是让他们活下去，而卢仁死去？同样道理，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正是为众除害，死了一个吸人血的“蜘蛛”，却使成千上万的人活着。按照这一逻辑，杀死老太婆是无罪的。

索尼娅为全家人不惜牺牲自己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拉斯柯尼科夫的心。他第一次来到索尼娅住处时，跪倒在她脚下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膜拜。”索尼娅怀着基督的爱，甘愿为人类受苦。他让索尼娅念《新约全书》给他听，他发现他们走的是一条路，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卖淫妇。他彻悟了，决心去受苦，并让索尼娅同他一起去。第二天，他向索尼娅说出了凶杀案的真相，并说他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杀了人。他问索尼娅怎么办？索尼娅说：“应该去受苦赎罪。”并表示愿意和他去，哪怕天涯海角。

侦探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来到拉斯柯尼科夫住处，他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对他说：“那个老太婆是你杀的。”他无言以对。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希望他去自首。

拉斯柯尼科夫来到母亲和妹妹的住处，告诉她们

自己杀死老太婆的真实情况。索尼娅给他挂上十字架，随后来到了警察局。副局长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给他倒了杯水，他用手推开水杯，轻轻地，断断续续地，但是清清楚楚地说：“是我用一把斧头把那个老女当主和她的妹妹理萨威泰杀了，而且抢了她们。”由于主动自首，他被判了八年徒刑。

他被关在西伯利亚某城的监狱中，不久，索尼娅也来到此地做裁缝。服刑期间，他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的一天清晨，他来到河岸上凝视那宽阔荒凉的大河，从高高的岸上，一派美丽的风光在他眼前展开。忽然，索尼娅出现在他身旁，她的脸消瘦、苍白，向他愉快地笑着。他突然跪在她的脚下，哭泣着，捧着她的双膝，她开始吓得要命，大惊失色。但很快她明白了，一道幸福的光芒闪现在她的眼中。她知道，并且毫不怀疑，他爱她超过一切，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爱情使他们更新了，心心相映，保持着生命无尽的源泉。他们决定等待，耐心地等待……

《罪与罚》是一部为人类感到伟大的隐痛的书，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凶残不仁的最强有力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无路可走，这是小说的主旋律。穷人连自杀都是一种奢侈，正是这种情况推动人们对自己进行道德的犯罪，破坏道德是犯罪，不破坏道德在对亲人的关系上也是犯罪。整部小说充满着大城市日常生活

的普通的悲惨的景象，这种生活的平日的司空见惯的噩梦。拉斯柯尼科夫梦见的被人一边笑一边往眼睛上抽打，打得几乎送命的、痛苦的、禁不起过分的重荷而疲累不堪的驽马的形象，是小说中的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抒情的与悲剧的形象。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临终时听说的几句话：“把驽马给骑累了！……力气用尽了呀”与此相呼应。

在引导拉斯柯尼科夫犯罪的动机里，交织着“拿破仑式”主题和无业游民式的绝望反叛主题，作者倾向于第一种主题，可是毕竟在小说中保留了第二种方案的许多东西，他向索尼娅阐明第一种方案，向冬妮娅阐明第二种方案。拉斯柯尼科夫全部理论的最重要一点即是：所有的人被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种。平凡的人必须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而不平凡的人就有权利从事各种犯罪行为，形形色色的犯法，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波尔菲利这样阐明拉斯柯尼科夫的思想，而拉斯柯尼科夫认为这样阐述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切完全符合后来尼采的“超人”思想。第二种方案在拉斯柯尼科夫与妹妹的谈话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拿破仑气质”和拉斯柯尼科夫的资产阶级无政府性的抗议原来只是个人主义的放纵的各种不同形态而已。这种放纵总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他

在小说中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真理：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出针对它而发的资产阶级形式的抗议，这些形式是在无出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些社会抗议和革命斗争的真正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不想看到，并且力图用自己的小说去诬蔑他们。

《罪与罚》的题材的意义及其内在的感动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拉斯柯尼科夫进行着奇怪的“实验”，要解答：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不能够“破坏原则？”他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特选的人，能够毫不感到良心责备而去完成为获得统治权，在他生活的社会里获得成功——包括罪行在内——所必需做的一切？他是不是用真正的统治者，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赖以造成的材料造成的？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件事，应该会回答他这个问题。犯罪后得出的结论：他不是，不是用那种材料造成的。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说：“人是必须征服的！”

《罪与罚》的题材意义和内在感动力却可以用以下的话来表达：不，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他像高略德金那样太软弱的缘故。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拉斯柯尼科夫很强大。作者强调指出，不管是罗季昂·拉斯柯尼科夫，还是气质上与之相似的妹妹，都属于选中

一个什么思想就始终为之效命并不惜忍受痛苦的那种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自首，是因为他——虽然不是用理智，而是凭他整个的天性——不再相信他的残忍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卡特科夫说，拉斯柯尼科夫自首是不得不然的。不得不然，是为了纵然死在狱中，却可以重新接近人：他在犯罪后立刻感染到的和人疏远和隔离的感觉，折磨了他。他在犯罪之后，脱离了整个人性的东西。他恐惧地注视着，他丧失了拥有人类感情的可能，他最爱的是母亲和妹妹，可是怀着对她们和对自己的反感，他开始憎恨她们。因此，在《罪与罚》里表现出对于完全违反人性和人道的生活法则所感到的战栗。所以，小说里真正的“罚”不是服苦役，而是折磨着他的和人性脱离的苦恼，是争取自己是一个人的可能性的斗争，是针对良心的斗争，这才是最大的罚。

悲剧发展的主线是围绕拉斯柯尼科夫展开的，从未被次要情节打断过。马美拉多夫一家的悲剧是拉斯柯尼科夫的理论和行为最强有力的动因，正像母亲来信中提到的支配着妹妹命运的斯维里加洛夫的动机一样(地主老爷有权占有一个穷苦的姑娘)。

小说通过索尼娅式的屈从，宣扬逆来顺受鼓吹以宗教信仰来代替反抗，这无疑是反动的，就像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时曾深刻指出他“一方面，是最清醒的

现实主义”，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具有同样的矛盾。不过，《罪与罚》对黑暗现实的描绘和批判，如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对卢仁的冷酷卑鄙和极端利己主义，对地主斯维里加洛夫的荒淫无耻的批判，都突破了作家的反动说教，闪耀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光芒。因而，这部作品才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第九章 最后一次恋爱

在写《罪与罚》的那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近郊度过了一个夏天。他住在妹妹薇拉·米哈伊洛夫娜·伊万诺娃的柳布林田庄中的一套别墅里，驱使他迁居到这儿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写作上的需要，还有一个十分隐密的原因。那年夏天，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寄居着一位新娘子——全家人都非常喜爱的叶连娜·帕夫洛夫娜·伊万诺娃。她是伊万诺夫医生的弟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这位年轻女子以她十分可爱的性格、聪慧的头脑和极其认真的办事态度使所有的人为之叹服。可是她在家庭生活中却很不幸：她丈夫身患重病，这对他的性格有明显的影响。他对妻子充满着妒意和猜忌，残酷地折磨着她的生命。医生已宣判了他的死刑，伊万诺夫家中所有的人都毫不掩饰地期望他们所喜爱的新娘子能尽快地再嫁给不久前丧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者是全家的另一个骄傲，深受大家喜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似乎赞同这个计划，最近的几次恋爱给他带来不少烦恼，他现在很想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物色一位善良、恬静、有文化教养并

能操持家务的女友，而叶连娜·帕夫洛夫娜无疑是一个理想人选。就是叶连娜对这件事也并无异议，他们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交谈，现在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唯一障碍就是那个未死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了。

在柳布林的夏天发生的这件事表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可是三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突然宣布同安·格·斯尼特金娜订婚，这又使一切都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一纸苛刻的合同说起。他和出版家斯捷洛夫斯基签了一纸奇怪的合同，这个66年11月1日以前写出一部未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的新的长篇小说，其篇幅不得少于大开本十个印张，倘若写不出来，斯捷洛夫斯基就将有权得到一大笔违约金。如若在12月1日以前仍交不出这部长篇小说，他，斯捷洛夫斯基，在今后九年中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意出版作家的作品，而无须付任何报酬。

到10月1日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新长篇小说还一个字都没写呢，他当时正在为《俄国导报》写作《罪与罚》，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写这篇东西。他的朋友米柳科夫也替他着急，他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几个朋友来，把他一个现成的写作计划讲一讲，然后每个朋友包写一章，由他统稿，交出去以应付那纸合同。可是这个建议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拒绝，

因为他不愿意在别人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米柳科夫只好建议他去找一个速记员来口授，这个建议倒获得了他的同意。于是第二天，著名的速记教员奥利欣班上最有才干的学生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被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儿来了，安娜的到来，改变了作家的后半生。

1866年10月4日12时，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然而后者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十分愉快：他无精打采，忧心忡忡，脸上带着怒气，似乎被某种倒霉事给彻底压垮了，连眼皮也懒得抬，而且口授时也心绪不佳，对于漏掉一个句号也特别生气。告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说几句客气话，却没说出口。他和她有以下的对话：“我感到高兴的是，奥利欣给我派来了一位女速记员，而不是男的，您晓得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男人都爱酗酒，至于您嘛，我想您是不会酗酒的。”

安娜觉得十分可笑，不过忍住了笑。

“至于我嘛，大概是不会酗酒的，这一点您就尽管放心好了。”

头几次的口授是在紧张和惴惴不安的心情下进行的。因为口授者总是那么焦躁不安，要求严格，而安

娜本人也并不需要靠这种艰巨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的女儿柳博芙·费奥多罗夫娜谈到这一点时说，倘若有人那天向她妈妈预言，她还得上14年的时间里继续使用速记方法默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她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但安娜细心而准确的记录，渐渐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静下心来，创作速度也明显加快了，作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题材，不断加深艺术构思。

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对成功日益增长的信心，使得作者对自己的女助手的态度也有了改变。他终于注意到了她那可爱的容貌，青春的魅力和独特的风韵：一双十分好看的灰眼睛显得既聪明又炯炯有神，宽大的脑门，刚毅的下颌。作家渐渐变得很乐意同这位可爱的姑娘、机智的交谈者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或回首往事。她很快感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一天比一天更殷勤和亲热了。

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期口授完自己的中篇小说，这就是小说《赌徒》，最开始叫《轮盘赌城》。30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把最后一次速记记录的誊清稿给他带来。那天正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日，他对自己的新作品作了最后加工。

10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手稿去找斯

捷洛夫斯基，仆人告诉他主人不在。他又去他的办公地点，管事人却不愿接受这份根据他不知道的合同写出的手稿，最后费尽周折他总算把手稿交给了斯捷洛夫斯基所在街区的警察所长，索取了一张收条。

扣除违约金的可怕威胁终于消除了。

当工作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天对自己的女速记员说，他似乎正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他面前摆着三条路：或者去东方，去伊斯坦布尔或耶路撒冷，永远定居在那里；或者去国外轮盘赌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消磨在赌博上；或者再次结婚，从家庭中寻求幸福。安娜建议他选择最后一条路。

11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拜访自己的合作者的家，请求她用速记的方法帮助他完成《罪与罚》的最后一部。

安娜的家在郊区，她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掌管着两座木结构楼房和一幢两层石头楼，两座木楼是两个女儿的陪嫁，每座价值一万五千卢布，命运使得安娜从小就成了这座房屋的全权主人，她把房间租出去，自己负责修缮，负责办理房客的公民证书和其他事宜，因此她从小对生活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培养了干练、果断的办事能力。

这次拜访是事务性的，他们商量好近日内就开始口授《罪与罚》最后一部，这一部必须于翌年初在

《俄国导报》上刊载完毕。

11月8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前来接受新的工作，她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点激动不安。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她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坐在箱子前翻阅文件，突然里面有东西闪起光来，是一颗明亮的小星星。他继续翻阅文件，那颗小星星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后来他慢慢整理，在里面发现了一颗小小的钻石，熠熠闪光。但是钻石的下落却没有梦到。

后来说了一些关于梦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变化很大，让安娜感到害怕，于是她急忙问他最近在忙什么。

“我计划写一个新的恋爱小说。”他说。

“新的吗？有趣吗？”安娜问。

“我觉得很有趣，只是结尾处理不好。难处在于摸不透一位年轻姑娘的心理，如果是在莫斯科，就会叫我侄女桑涅契卡提提意见，可是现在我得请您帮忙了。”

安娜很得意，准备“帮助”这位伟大的作家了。

“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谁呢？”她问。

“一位艺术家，不年轻了，好，简单点说，是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

“请一定告诉我，就说下去吧。”对这个爱情故

事抱着好奇心，她请求道。

为了满足她的要求，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在此以前或以后，她从未听过费奥多尔讲过这么富于灵感的故事。他越讲，她就越清楚，他是在讲自己的生活，只是把姓名和环境改换了一番。从前他对她讲过的零散片断都几乎包括在内了。现在他详尽的、连贯的叙述把他和故世的妻子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叙述得清清楚楚了……

“……这位艺术家在生命的这个决定性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说，“遇到了一位像您这么大的姑娘，或许比您大一两岁。咱们就叫她安娜吧，觉得叫她作女主角，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啊——”

他的话使她相信他的女主角指的是安娜·科尔涅——克鲁科夫斯卡娅。她忘了自己的名字也叫安娜。

“……这位在性格和年龄上和我的艺术家有着如此悬殊差别的年轻姑娘，难道会爱上他吗？这会不会是一种心理上的幻觉？因此，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您的安娜，就像您讲的那样，不是一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是一个心地善良并富于同情心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难道爱情只是为了外貌和财产？从她这方面说，这又算得上什么牺牲？既然她爱他，她自己就

一定会感到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懊悔。”

安娜说得很热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不安地瞧着她。

“您果真相信她会真心爱上他并爱他一辈子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有点犹豫不决。

“假定说，您就是那个姑娘，”他说……“那个艺术家就是我，请想想看，倘若我向您表白了我的爱情，并请求您做我的妻子，那么您会怎样回答我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不好意思，那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终于明白了，这并不是般的文学谈话，倘若给予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就一定会使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受到可怕的打击。她朝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张对她来说是如此可亲可爱而又激动不安的面孔看了一眼，说：

“我会这样回答您：我爱您，并将爱您一辈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走安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现在我知道那颗小钻石的下落了。”

“您还记得您的梦吗？”

“不，我不记得那个梦了。但我找到了那颗钻石，并且要把它保存一辈子。”

“您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她大笑说道：“你找到的不是一颗钻石，是一颗石子啊。”

“ 没错，我相信这回我没弄错 。”

陀思妥耶夫斯基平静地体验了这次新的爱情。然后他们订了婚，因此柳布林那桩大家认为应该发生的婚姻也就没有下文了。订婚后，这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令人焦虑不安和富于戏剧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率地对他的未婚妻说，《时代》杂志的倒闭使他背上了一身债务。他需要抚养人口众多的家属，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经济上的拮据状况令人不寒而栗。

安娜明白，如果再这样不知休息地工作下去，势必把她未来丈夫的身体彻底拖垮，她还知道，为了还债，他经常典当自己的物品，在安娜这位讲究实际和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补救的灾难。冰雪刚开始融化，他的家人就把他的皮大衣典当了。尽管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愿接受来自安娜的任何钱财方面的帮助。

1867年2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在伊斯梅洛夫大教堂结婚。新郎45岁，新娘20岁。距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婚礼整整十年，第二次婚礼很豪华，也很隆重。但相比之下，第一次婚礼尽管仪式简陋，就他爱情的力量和感受的悲剧性而言，却是十分庄严的。

喜宴、拜客、晚会。突然，安娜·格里戈里耶夫

娜发现丈夫患有严重的痼疾。谢肉节的最后一天，他们在姐姐家做客，客人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兴奋，给她姐姐讲一件趣闻，突然，一句话没说完就停住了，脸孔煞白，从沙发上微欠起身子就向安娜这边歪过来，她吃惊地望着他那变了形的脸，他蓦地发出一声可怕的、惨绝人寰的喊叫，身子就向前倾到下去，那天晚上，他的病犯了好几次，听着他那一连几小时不停顿的喊叫和呻吟，望着他那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完全变了形的面孔，瞧着他那像疯子一般呆滞不动的眼睛，而且一句也听不懂他那前后不连贯的话语，安娜几乎认为，她的丈夫准是神经失常了。她为他担惊受怕，不寒而栗。

他们的蜜月因为这样那样的不愉快事情而变得非常扫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近亲，包括已故长兄米哈伊尔全家人和继子帕莎·伊萨耶夫，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他的续弦充满嫉妒和敌意。《时代》杂志的债主们拿着数额巨大的执行票纷纷登门索债，并威胁要查抄财产。这些索债的借据有些是不足为凭的，因为杂志一直由哥哥经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真相。例如一位作家来索要稿费，七八年后才发现单据原来已经支付过了，因此新婚夫妇决定出国旅行，哪怕只旅行到秋天也好。又从卡特科夫那里预支了一笔钱，但这笔钱也不足以应付旅途中的庞大开支。安娜·格

里戈里耶夫娜决心把自己的妆奁全部贡献出来，以拯救自己的幸福。她把新家具、大钢琴、皮货、金银首饰、彩票全部典当出去。“我们原想旅行三个月，但过了四年多才返回俄国。”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回忆道。在旅游期间，她的财产几乎全部花光。“不过在国外，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了一种新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他逝世。”

第十章 漂泊的旅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旅程从德累斯顿开始。此时，战争的乌云正笼罩着欧洲大陆，正值普法战争和建立巴黎公社的前夕。这使他不仅能从报刊上，而且能够从近处密切注视国际局势的发展。

抵达德累斯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带领妻子去参观了绘画陈列馆，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艺术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世界绘画作品使他感兴趣的首先是其哲理方面，那些绘画是他未来艺术构思的强大刺激因素，也是永恒人物形象的天才体现。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尔宫内，16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汉斯·小贺尔拜因成了他最喜爱的画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梅耶尔市长家的圣母》是隐秘而平静的哀愁的最高体现。“贺尔拜因的圣母像画得多么纯洁，多么美啊！”他还含蓄地指出，他的作品《白痴》中那两位俄国姑娘的书信就是用贺尔拜因圣母像的笔记写成的。

在收藏有文艺复兴时代伟大艺术珍品的宝库中，最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关于放荡女人的富有诗意的神话故事。玛丽亚·马格大林由于一个完美人物的

不可企及的心灵美而获得了新生，是福音书中最受人欢迎的故事。它在艺术中，特别在绘画中得到过无数次的体现。这一题材曾使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不已，他在《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中提到过当代法国画家埃米尔·西诺尔的绘画《耶稣宽恕有罪的女人》。20年后，这一富有诗意的古老传说又通过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中的油画重新向他展示出它的深刻性和悲剧性，所有这些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惶悚不安和疲惫不堪的几个星期中所亲身感受到的。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新作，力图以自己残酷的时代为背景，广泛展开这一充满悲剧性的古老传说。从1867年秋天起，他开始拟订《白痴》的写作计划。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长篇小说的札记中不止一次指出，他的题材和古老传说有相似之处，并对其主题思想作了这样的解释：“公爵——就是基督”；“接待公爵时的热烈和充满温情的场面（福音书中所描写的放荡女人在神庙中受到宽宥）……阿格拉娅在拜访娜司泰谢·菲利波夫娜时说，扮演马格大林的角色是卑鄙的”，等等。

1868年初，他把新小说的主题思想归纳为：描写极其美好的人。他把这一题材同一个心地纯洁，他十分珍视的年轻姑娘的形象联系起来，这就是他的外甥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外甥女曾经历了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内心感受——这是一次深刻的纯洁的精神恋爱。索菲娅是家中的长女，很早就开始帮助父母料理家务了。她有一张聪慧、开朗、严肃而又招人喜爱的面庞，她的目光深邃、沉思而又充满热忱，是一个充满无穷怜悯心和不屈不挠意志的女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她的信中，常常流露出无限的赞美之情：“您是我的心上人。您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女儿”，“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把您看作一个最高尚的人，我无限尊敬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姑姑去世了，亲属们在分财产时意见分歧，他和他们吵了一架，也和自己的妹妹关系破裂了，外甥女站在母亲一边，从此他们的联系中断了。不过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道：“我亲爱的圣洁的索尼娅，我爱您，就像爱我的孩子一样，也许还有过之。”

作家的另一个外甥，年轻的医生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卡列平常被人取笑，其实他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而又招人喜欢的青年。他记忆力特别好，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能就任何问题发表长篇即席演讲，为了用原文阅读他特别喜爱的《堂吉珂德》，他还专门学会了西班牙语。他是一个异常温和的人，但也难免有一些刁钻古怪的偏差和行为，因此，大家管他叫“白痴”，这个外甥对于梅什金公爵的塑造，也起到

一定作用。

《白痴》的故事大致是这样：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穷困到无以为生的地步，而且患有癫痫症。有个慈善家把他送到国外一个名医那里去就医，几年后返回彼得堡。

梅什金在显贵的近亲叶潘钦将军家里看到貌美出众的娜司泰谢·菲利波夫娜的一张照片。她是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有人正打算把她嫁给叶潘钦将军的秘书笏纳·伊沃尔金。聪颖敏感的梅什金立即在这位不平凡女子的面庞上看出一种内心痛苦的表情。关于娜司泰谢的那段肖像描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篇页之一。亚历山大·布洛克曾把那段描写当作自己剧本《陌生女郎》的卷首题词。

这个女人的人生际遇是十分悲惨的。她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自幼父母双亡，沦为孤儿，由富商托茨基抚养成长，后来成了他消遣娱乐的工具。但这位头脑聪慧、思想深邃、才智出众、意志坚强的姑娘，毅然奋起反抗专横霸道、欺侮女性的行径。她随时准备向那个粗暴地践踏她关于人间幸福和生活的幻想的社会进行报复。她力图从虚假伪善、厚颜无耻和卑鄙龌龊的室人环境中挣脱出来，重新做人。在跟与她周围的那些彼得堡上流社会人士迥然不同的梅什金公爵邂逅相遇以后，她爱上了他。

梅什金公爵体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美好人物的观念，他谦虚、诚实、敏感，同情一切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们，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幸福与和睦，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社会上所有那些过着荣华富贵生活的人视为“傻瓜”、“白痴”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梅什金公爵认识娜司泰谢·菲利波夫娜以后，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种出于怜悯的爱。

“您受尽了苦难，现在清白无辜地从这座地狱里出来了。”他这样对她说道，对于她那受难者的美质感到不胜惊讶。为了把她从骄奢淫逸和骇人听闻的首都“半上流社会”上解救出来，他请求她做他的妻子。但她对他只报之以一种倾慕之情和受害者的爱情：“托茨基的情妇”是不会“戕害一个孩子”的。她把自己对梅什金的爱情沉浸在纵酒狂饮之中。当她坐上马车跟罗果静一同离去的时候，她向梅什金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再见吧，公爵，你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他们的关系很快复杂化了。年轻的百万富翁罗果静疯狂地爱上了娜司泰谢·菲利波夫娜，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放荡本性和欲念。

由于不敢奢望把自己蒙受过耻辱的命运同一个光明磊落、品德端正的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娜司泰

谢·菲利波芙娜接受了落拓不羁的罗果静的崇拜，但她又以炽烈的情感和机敏的智慧竭力促使她那个成年的“孩子”得到幸福，想方设法促成公爵与叶潘钦将军的女儿、聪明美丽的阿格拉娅的婚事。在她看来，她这一计划是值得促其实现的。她给那位姑娘写了几封妙不可言的信，详细陈述了公爵对她的爱和自己永远放弃公爵的决心。

然而，两个女人的亲自会晤很快便导致她们关系的断然破裂。梅什金对两个女人都很忠诚，对两个女人都充满友好的感情，但在关键时刻，却站在了蒙受侮辱和痛苦的娜司泰谢一边。他们已处在幸福的大门口。公爵带着她去举行婚礼。

可是，娜司泰谢·菲利波芙娜仍在为寻觅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而辗转不安。正因为如此，当罗果静出现时，她才显得束手无策。罗果静把梅什金的未婚妻带到自己的家里，在绝望和嫉妒心的发作下，把她杀死了。

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精心描绘的一个理想人物，他心地善良，既有自己的爱情，又助人为乐。然而，在那个拜金主义的世界上，他也不得不听命于苦难、绝望和毁灭的普遍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种充满深刻诗意的象征性手法，表现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那个追逐暴利、淫秽放荡和充满罪恶的王国里，心

灵美好的人物往往都命途多舛，屡遭不幸。在世界文学印象中，最接近梅什金的是塞万提斯创造的堂·吉珂德骑士，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的永恒形象之一。他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部作品更深刻，更富于感染力了”。堂吉珂德和梅什金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同这个无力挽回的现实社会做一种徒劳的搏斗。但梅什金并不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和改革者被加以描写的，而堂吉珂德是一旦产生了某种想法，便立即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

娜司泰谢·菲利波夫娜体现着精神的颖悟与纯洁，体现着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作者是以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腐朽环境为背景来刻画她的，出色地描写她如何对她所遇到的第一个内心世界极其高尚的人产生了崇高的爱情。

她的形象和阿格拉娅·叶潘钦形成鲜明的对照。阿格拉娅是一个性格坚毅、头脑聪颖的姑娘。她能够对自己的环境采取批判态度，竭力冲出樊笼，去过自由的生活。“我不想把时光都浪费在跳舞晚会上，就想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她对革命书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她阅读过所有的禁书”。在小说的结尾，阿格拉娅同自己的贵族家庭决裂了，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位波兰革命家联系在一起，以便为解放他那受奴役的祖国而斗争。

在娜司泰谢看来，她绝不能以自己的过分亲昵使她的可怜的骑士的纯洁形象受到玷污——这一想法迫使她从婚礼上跑掉，投入罗果静的怀抱，并接受了他亲手加诸于她的致命打击。

小说家塑造的罗果静的形象，体现着一种容易冲动的、不可遏止的强烈情欲，这种情欲在抗争激烈的时候往往化为毁灭性的嫉妒。

他天性粗野、热情洋溢、热衷于追求强烈的刺激。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善于抑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像一阵轻风似的在生活的旷野里自由自在地到处飘刮着。他还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什么书也没读过，甚至连普希金的名字也不知道”。说起话来像大老粗，往往文理不通。衣着时髦，但并不美观：鲜艳的领带上别贵重的佩针，肮脏的手指上戴着又大又笨重的宝石戒指。这个慷慨豪爽、性格勇猛的形象，极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当他明白娜司泰谢对梅什金怀有深情厚爱后，他决心杀死他。但罗果静那颗天生高贵的心却被公爵感化了，准备放弃罪恶的阴谋，并与他结拜为兄弟。但他的牺牲太大了，他仍采取了谋杀行动，只是当身患癫痫症的公爵发出惨绝人寰的喊叫：“帕尔芬，我不信”时，他才住了手。

但他的嫉妒心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他使那颗充满纯洁爱情和罪恶情欲的犹豫不决的心永

远停止了跳动。他默然地、沉思地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服苦役，他准备走上净化和复活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德累斯顿的生活是恬静而舒适的。他们在公园散步，坐在露天舞台前倾听交响乐队演奏莫扎特的作品、罗西尼的《圣母哀歌》、瓦格纳的歌剧《黎恩济》中的进行曲、贝多芬歌剧《菲岱里奥》中的前奏曲。“再没有比这支曲子的意境更高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给妻子写道：“贝多芬的作品中充满着激情与爱情。他是一位歌颂爱情、幸福和失恋痛苦的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几家藏有法文和俄文书刊的图书馆里预订了座位，在那里他反复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等。安娜天生喜爱古玩，而且她强烈的求知欲也使丈夫吃惊，他们喜欢这种孤寂的生活，经常同友人通信。但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来信搅扰了这个家庭的平静，它常使安娜深感不安。但由于后来他们经常变换地点，这种通信也就渐渐中断了。

在德累斯顿旅居了两个月后，他们去巴登度夏，巴登是著名的疗养胜地，那里盛行轮盘赌。

抵达巴登后，他们在“金骑士”旅馆下榻，但由于第一天就输了钱，旋又搬到一个僻远的街区，在一家铁匠铺的楼上租了两个小房间，震耳的打锤声整天

响个不停。大楼里充满孩子们的啼哭声和喊叫声。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毫无怨尤地听从命运的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由于睡眠不足，常常发火动怒。

巴登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旅欧四年期间所遇到的最使他们伤心的一个城市。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旅游生活到最后竟变成一场真正的悲剧。他们刚到巴登，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遇到伊·亚·冈察洛夫。后者告诉他们：屠格涅夫也已抵达此地。他在其好友波林娜·维阿尔多的别墅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楼房。欧洲所有的知名人士都聚集在他们那里。冈察洛夫似乎还转告了如下的话：屠格涅夫前天晚上在轮盘赌场上看见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但没有走近他，因为赌博者都不喜欢这样。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曾借过屠格涅夫的钱，所以他应该去一趟他那儿，否则屠格涅夫还以为他怕索债而不愿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第二天就去拜访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因此欠钱的事倒好解决，问题是近几个月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他和屠格涅夫在思想上疏远了，他去拜访他，只是为了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

长篇小说《烟》竣稿于1867年初，是屠格涅夫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它自发表以来，引起各党派和各文学派别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各派人士，不论是打着红旗的还是打着白旗的，都对它大肆谩骂。”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写道。

《烟》的作者“极端西欧主义立场”，他“对斯拉夫派和根基派的民族理想的否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能接受的。

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言词相当刻薄、激烈。临走时，他把三个月来郁积在自己心中的对德国人的愤懑全部发泄了出来：“这里的平民百姓比俄国的平民百姓卑鄙无耻得多，毫无疑问，他们更加愚蠢。您在这里大谈什么文明，可是文明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在我们面前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

他们彬彬有礼地告别了。“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再也不登屠格涅夫的门槛。”

屠格涅夫也下了这样的决心。他第二天上午10点钟顺路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他知道后者不会在12点钟以前起床），并留下自己的名片——这是绝交的信号。

他们后来在轮盘赌场上见过面，但谁也不和对方打招呼。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他的债，直到1876年

3月才还给屠格涅夫。

顺便还要提一句，这两位多年敌视的作家，终于在他们去世前不久，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仪式上重修旧好了。

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热情、急躁、好冲动，对什么都容易入迷上瘾，这种性格常常使他陷入绝望。这种性格在赌博这件事上体现得那么强烈：他认为他不是因为贪财才赌博，而是因为赌博本身是那么吸引人。

他常常不但把现钱输得精光，而且把典当东西得来的钱也输得一干二净。有时也会交好运，但赢来的钱不会在手里留存多久，最终还是输掉了。当实在无钱往赌场上拿，而且，又无处筹到钱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显得郁郁不乐，心灰意懒，有时甚至失声痛哭起来。他跪在安娜面前，请求她原谅他给她造成的痛苦，而安娜尽量用好言安慰他，要他相信，他们的处境并非毫无希望，尽量把他的注意力往别的方面引。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不断地输钱，他的种种侥幸心理，孤注一掷，在赌博这个魔鬼面前束手无策，完全听命于自己发明的赌博方法。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常常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不走运和失败。“全输光了”，“把怀表也抵押了”，“请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寄

点返回的路费吧”。

被抛在另一个城市里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举目无亲，茕茕子立，而且怀着孕，整日价提心吊胆，惶悚不安，尽管手头拮据，仍尽最大努力给他寄去20块金币，希望他结束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返回自己身边，不几天她就收到回信，钱又输光了。她能说什么呢，她将重新给他寄路费，重新等候输钱的消息。安娜的首饰当掉输了，结婚戒指也输了。每次输钱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像孩子似地嚎啕大哭，安娜还得尽力安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充满着惭愧、痛苦和悔恨的书信，比他长篇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更富于感染力。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离开巴登这个使他们蒙受了那么多苦难的赌窟前往日内瓦。风光秀丽的日内瓦带给他巨大的喜悦，也带给他一生中最强烈的打击。在这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索尼娅诞生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极其温和的父亲，他在自己新生女儿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对她百般爱抚。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的床铺前，给她唱歌，跟她说话。他醒后或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索尼娅怎么样？身体好吗？睡眠和饮食都好吗？”直到年近半百，他才第一次体味到做父亲的幸福。然而这种幸福感没有维持多久，三个月不到他的女儿就夭折了。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漫长而屡遭不幸的一生中，这次打击甚至超过以前所经受的历次可怕考验。他悲痛欲绝，站在心爱女儿已经冷却的尸体前，痛哭不止，热烈地吻她苍白的小脸和小手。他第一次向安娜讲述了他一生中因为失掉亲人而感受到的痛苦和悲伤。

第十一章 一部诋毁革命的反动作品

日内瓦湖四周的群山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悒郁不乐，因为他觉得它们缩小了他的视野。他们决定去意大利过冬。从1868年9月初起他们开始漫游意大利。在这期间，他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定名为《大罪人传》。构思这部作品的起因来自于托尔斯泰1868年竣稿的《战争与和平》，这部鸿篇巨著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热烈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尝试一下这种“荷马式”的体裁，以便把他关于当代人的珍秘构思体现在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中，早在1868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形成了一部关于无神论的长篇小说的主题：一个俄国怀疑论者的人生经历，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在各种神学派别和民间教派中间动摇不定之后，“终于皈依了东正教和俄罗斯土地”。

然而，要想描写当代俄国探求真理者的这种“苦难的历程”，就必须到俄国去，而且，那部业已开始动笔的关于俄国革命的长篇小说（指群魔——编者），也要求他这样做。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准备返回俄国。

1871年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回到俄国。对于他们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结束了。他后期作品的一些主要艺术构思都是在国外最后确定下来的，他最后三部长篇小说中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也是在国外牢固形成的。

然而，创作意图自有它自己的机缘，在艺术家的创作室里，一些新的紧迫主题湮没了1868年的写作计划，在他构思的那一组作品中，只有某些特点在他最后的三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是《大罪人传》的残缺不全的实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居欧洲的最后一年，是欧洲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他对这一世界性事件密切关注着，他注视着新的人民国家如何在衰朽不堪的帝国废墟上诞生，并听到了新生的民主国家要求全世界劳动人民加强兄弟团结和要求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号召。巴黎公社引起了他对人类命运和未来历史道路的忧虑和沉思。

当1871年5月，斯特拉霍夫询问他对法国事件怎么看时，他按照业已定型的信念作了回答，这种信念与革命的行动相去甚远，却热烈地向往和追求最高的社会正义。他相信有一条通向全人类真理的特殊道路。“美能够拯救世界”——那个古老的欧洲，那

个创造过神圣奇迹的国度“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在这种极其珍贵的精神文明面前，现代革命能够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呢？”“巴黎战火是骇人听闻的现象，尽管在公社拥护者们看来它是一种美”，“西方失掉了基督，因而西方正在衰落……”。面对着广泛展示在人类面前的历史斗争的新的强大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禁锢在他那些衰颓的宗教和美学观念之中，他对于革命的不正确理解终于导致在他《群魔》这部小说中采取了反动的立场。

1869年12月，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德累斯顿的阅览室里传来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消息：莫斯科的暗杀事件，遍布整个俄国的凶险的阴谋活动，骇人听闻的政治恐怖团体，“人民惩治会”或“斧头社”的活动，日益高涨的俄国革命，两个威胁着所有欧洲人安宁和平静的名字——年迈的巴枯宁和年轻的涅恰耶夫。

一些年轻人在阴谋策划家、巴枯宁的亲密朋友和追随者谢尔盖·涅恰耶夫领导下，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秘密恐怖组织，以斧头为标志，取名为“人民惩治会”。在秘密会议上，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以涅恰耶夫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他并不掩饰他想从小组中分裂出去，另外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新的革命团体的意图。涅恰耶夫竭力使自己的伙伴相信：必须

清除掉这个危险的成员，因为他可能把他们出卖给政府。1869年12月21日夜，伊万诺夫被五个阴谋分子诱骗到拉祖莫夫花园内一个荒凉的所在，被暗杀了，尸体被扔进池塘。

这种前所未闻的政治上私设公堂的行为，很快便受到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

后来查明，涅恰耶夫执行的是巴枯宁的意志和计划。这个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踌躇地立即领悟到，他可以把许多珍贵的思想写进一部关于涅恰耶夫的长篇小说中，如同1865年一样，一个满口尽是有害的空洞理论实际上却从事着恐怖活动的不安分的大学生形象，又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他感到，他能够把这种思想上的犯罪过程描绘得惟妙惟肖，真切感人，他能够围绕着这桩“带有理论性的”凶杀案，提出并展开一些十分紧迫的激动着整个当代欧洲的问题。

随着涅恰耶夫凶杀案的被揭露，巴枯宁的个性格外为俄国和欧洲报刊所重视，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选作自己长篇小说中心形象——斯塔夫罗金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通过这一形象来体现他关于著名俄国造反者的种种想法，并力图表明，他那叱咤风云的一切活动都是徒劳无益的和毫无目的性的。正像他那闻名遐迩的个性一样。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释，这个代表着世界革命荣誉的人

物，只不过是一个囿于自我反省的俄国阔少爷，一个漂泊欧洲，脱离祖国根基的流浪者，一个沉湎于敏锐思想的人，他什么事也做不成，注定要碌碌无为一生，甚至遭到可耻的毁灭。

斯塔夫罗金体现着非凡的智力与脑力。在他身上，理智排除掉了其他一切精神活动，使他的整个精神生活处于麻木不仁和贫乏空虚的状态。一种具有可怕力量的思想，吞噬了他头脑中一切可以与之并存的东西，一种罕见的理智之神，使得一切丰富的感情、幻想、抒情诗般的激情都成了它的牺牲品——这就是斯塔夫罗金的个性。这个完全沉浸在理念之中的人物身上有一种可悲而又可怕的东西。那些令人兴奋的理论具有无比巨大的力量，扼杀了斯塔夫罗金所接触到的一切。那些理论的悲剧性就在于它无法变成创造性的理论，无法把毁灭掉的东西熔铸为另一种东西。斯塔夫罗金的死气沉沉，是一位天才理论家思想僵化的结果，因为他发现他不能使破坏的思想上升为创造的思想，不能把破坏的意志同创造的热情真正等同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的艺术形象作了讽刺性描写。由于十分了解讽刺的毁灭性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使用这一武器去惩罚“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他用冷嘲热讽来贬低这一形象，通过漫画式的讽刺描写使这个人物无权博得同时代人的赞扬和青年

们的崇拜。他竭力对这位党同伐异者加以揶揄挖苦，使他名誉扫地，通过描写他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来诋毁这位领导者的“英雄气度”，这位活动家的“宏伟气魄”果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曾以自己的可悲性格和顽强意志使同时代人惊叹不已的历史活动家，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艺术家的讽刺目的达到了，但那个具有非凡力量的历史人物却未能得到小说家全面和广泛的描写，未能得到艺术和哲学上的概括。他在小说里的名字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反虚无主义的长篇小说中，还广泛使用了文学上的讽刺性摹拟手法，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通过“大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所作的讽刺性描写上。借助这个人物形象，《群魔》作者表达了一种看法，即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位极端的西欧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是他们“共同的俄国事业”的敌人。这种看法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保守主义的政论文章中。在小说中，屠格涅夫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性格受到无情的揭露，他十分痛心地说到了这幅调整漫画的政治锋芒：“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使用了比讽刺性摹拟更为恶劣的手法，他通过卡尔马津诺夫把我描写成涅恰耶夫分子的秘密

支持者。”《群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诽谤色彩。

《群魔》是一部诋毁革命运动的作品，其任务是摧毁革命的运动及其“父”与“子”——4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60年代的实践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维护俄国的君主制，并猛烈抨击各种破坏和威胁君主制的力量。

尽管小说中充满暴露的热情，但小说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的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革命历史现象，并未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第一国际俄国分部的建立，各个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成立，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作品和创作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由于对当时革命运动的主流怀着冷嘲热讽的愤激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反映的主要是一些无关宏旨的，甚而是次要的现象。他针贬抨击的只是俄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反抗性和涅恰耶夫分子的过火行为。作为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重大主题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必然使他遭到失败，并导致他的政治意图的破产。但由于小说家本人年轻时曾向往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看来他并没有始终坚持他所采取的暴露笔调，在小说的末尾，他竟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到一个幡然醒悟的“光荣结局”，

而作家通过斯塔夫罗金对巴枯宁所做的讽刺性描写，也是一种败笔，因为斯塔夫罗金在小说中一直保持着严肃性和重要性，到后来甚至引起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和几近尊敬的关注。在巴黎公社问题上，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但他并没有和那些对公社持否定和诽谤态度的极右翼沆瀣一气。他所描写的涅恰耶夫分子，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具有生气勃勃和讨人喜爱的特点。同小说的基本战斗倾向形成明显矛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口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的好感。在研究《群魔》的时候，既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解放运动所作的种种辛辣讽刺，同时也不能避而不谈作家想通过“弑君者”卡拉科佐夫去理解革命一代的愿望。

1872年12月，长篇小说《群魔》在《俄国导报》上刊载完毕，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和非议。杂志创办者和社会活动家们一致谴责他完全加入了“卡特科夫的大合唱”，谴责《死鱼手记》的作者竟然转而去写新型的反虚无主义的小说。人们把它和当时轰动一时的反动长篇小说《结仇》联系起来，指责它过分近似于涅恰耶夫案件的审判纪录。

不过，几乎所有对《群魔》持否定态度的人，都把其中的几个主人公同这部作品中其他众多的人物区别开来，甚至认为这几个主人公写得相当出色。例如，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就博得人们一致的好评，被认为是一个“在艺术的真实性方面十分接近奥涅金·别尔托夫·奥布洛莫夫的栩栩如生的人物……”

就连那位严厉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的民粹派著名理论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承认这部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是“成功的”，甚而是“非常出色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作者选择了那种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题材——19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并把那些“荒唐可笑的思想”传给自己的主人公，这就注定他要走向失败。

由此就产生了他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如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的模糊不清，由此也就产生了整个作品主题思想的不可理解，群魔——似乎是指那些丧失了区分善与恶的能力的人。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应当把毁灭性的讽刺锋芒指向现实生活中那些真正凶恶的魔鬼——令人可怕的聚敛财富者，银行家和股东，工厂主和交易所经纪人，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指向“心灵如水晶一般纯洁而又坚硬”的富于积极主动精神的先进战士。

在早期评论《群魔》的文章中，这几乎是最好的一篇。

对青年的讽刺性描写，希加廖夫的理论，基里洛夫工程师的发疯，沙托夫的狂躁——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社会的图画，是在强烈的照明装置下进行的攻讦和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郁诗神驱使着人们摆脱人的形象，冷酷无情地扯断了人们希望的翅膀……并强行把人的思想感情填充在个人痛苦的徒然的孤寂之中”。但是较之许多文质彬彬和众所公认的作家们，评论家宁愿推崇“这位生硬的、笨拙的、带有偏见的，或多或少有罪但仍不失为天才的作家”，他的确配得上“莎士比亚的学生”这一称号。当时有一位评论家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不仅应当使他和第一流的俄国艺术家并驾齐驱，而且应当把他归入本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天才之列。”这种评价在当时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列宁虽然对《群魔》采取否定态度，但他却说在这部小说里，切不可忘记小说中所反映的事件不仅与谢·涅恰耶夫有关，而且与米·巴枯宁的活动有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有争议，我们为他写出这种歪曲革命的作品感到遗憾，可仔细想来，这是和他思想发展历程有关的。

第十二章 对现代派小说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以后不久，朋友们便把他引进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小组，后者是俄国保守派的首脑人物，写过一些内容空泛的关于上流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他在宫廷内颇有影响，有权提名大臣候选人，并在钱财方面卷入过他那些候选人的丑闻和可耻勾当。同这样一位政治投机家接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可悲事件，也几乎是他最大的错误。当时，梅谢尔斯基正忙于筹办《公民》阅刊，用他的话说，这个刊物“负有一项保守的战斗任务”。著名诗人阿·尼·迈科夫，费·伊·丘特切夫，著名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尼·尼·斯特拉霍夫和博·米·马尔克维奇，都是这一新刊物的指导者。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成了《公民》杂志的编辑，他在1873年至1874年初，一直负责这个刊物的出版工作。

他探索到一种新的政论作品形式：艺术家就当前的重大事件发表评论。《作家日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它讲述作者和别林斯基的争论，讲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会晤，评论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和俄国人民

的使命，评论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说《永远难忘的大使》，论述为民间剧院撰写的取材于工厂生活的剧本，回忆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恋——所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和引人入胜的题材，身兼编辑的作家把它们写得绘声绘色。1873年，以其具有尖刻讽刺性的短篇小说《豆子》为起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那一组绝妙的中短篇故事《温顺的女性》、《一个荒唐人的梦》、《圣诞树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开始陆续在该刊发表，这是作家运用短小文艺体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公民》编辑部的工作，很快就变得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忍受了。进步刊物严厉谴责这位著名作家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同作者谈话、阅稿、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在这家半官方刊物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中进行的。刊物的新编辑同他的暗中领导人梅谢尔斯基的意见分歧很快便暴露出来；针对《公民》创办人的种种浅薄而又卑劣的政治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提出自己的纲领：“我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是一种对立物，我很想把这一想法写进一系列文章中。可是我却做不到。”

被刊物占去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中长篇写作。在编辑部令人窒闷的气氛中，他所珍视的是同一些年轻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交往，他们使他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探索和幻想。

在《公民》杂志的许多合作者中，有一位叫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他当时是内阁成员和给大公们讲授法律学的教师，是沙皇制度末期反动政府中最阴险可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十分器重《罪与罚》的作者，积极协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刊物，并竭力从思想上对后者施加影响。

然而就连这样一位高级人士的庇护，也不能巩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编辑部中的地位。早在任命他为该刊编辑的时候，第三厅就作过这样的表示：“对此人将来的活动概不负责。”梅谢尔斯基的刊物经常受到指责，说它违反了书报检查制度，各种行政处罚如同冰雹一般落在它的头上。1873年6月，书报检查委员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起诉，法院判决对他实行罚款，并将他关进军队禁闭室。1874年3月11日，内务大臣指控《公民》周刊“发表了一些旨在煽起对帝国某一部分人士敌对情绪的言论”，并于3月12日对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负责编辑和出版的杂志提出第一次警告。

这实际上是威逼“政治性报刊”的负责人停止其职务，否则该刊就有被查封的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理解的。他遂于3月19日向出版总署提出辞呈，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请求解除他在《公民》编辑部的职务。

不过在解除职务之前，他还得根据法院判决，被拘留在军队禁闭室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公民》周刊的编辑受审的，理由是他未经宫廷大臣许可，擅自在刊物上登载有关“高级人士”的秘闻。在法庭上，作家不承认自己有罪，于是他被判罚款25卢布并拘留两天。

谁也不急于执行这项业已作出的决定，不过行将到来的和刊物决裂要求尽快结束这桩“公案”，于是警察分局长于1874年3月21日晨前来找他，把他带到区法院，在那里向他宣布了拘留地点。那是干草市场上的一座监狱。

他被安置在一间“相当整洁的宽敞房间里”，他坐在一张普通的小桌旁，一边喝茶，一边抽着他那个像炮筒子似的烟斗，聚精会神地阅读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把我关起来，这倒是件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跟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谈话时诙谐地说，“要不然，我未必有时间重温这部杰作很久以前留给我的那种美妙的印象！”安娜带着“别人的问候”来探望他，迈科夫也来了，然后是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他喜欢和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家谈论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他回忆起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不断发挥他最喜爱的关于适应性的理论：死水一潭的生活的突变，往往会

使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得到拯救：

“西伯利亚和服苦役——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幸福！……亲爱的，我在那里了解了自己，了解了基督，了解了俄国人，并感到我自己就是一个俄国人，是俄国人民中间的一分子。我的一切最好的想法都是那个时候钻进我头脑中来的，现在它们只是又重新回来了而已，而且还不十分明确，咳，可惜您没有被流放过。”

第三天中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释放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儿童玩具商店去了一趟。

1874年4月22日，《公民》上刊登了一项特别声明，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健康原因辞去编辑职务，“但只要有可能，他还会经常参加编辑部的工作。”

的确，直到70年代末，他仍不断在《公民》上发表一些短小的匿名文章，但他从未回到那里从事经常性的编辑工作。他永远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现在他很想根据《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撰写一部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

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拜访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建议他为下一年的《祖国纪事》写一部长篇，并答应按每一印张250卢布付给稿酬，这要比小说家通常的稿酬标准150卢布高得多。他们认为，刊

登俄国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的作品于他们的刊物是相宜的，另外，他们希望借此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进步文学界，使他将来能脱离《俄国导报》和《公民》杂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马上答复涅克拉索夫，因为他一直是《俄国导报》的撰稿人，他要问清《俄国导报》的下一年稿件是否已组齐。他去了一趟莫斯科，他获悉《俄国导报》下一年已接受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稿子，但他仍迟迟没有答复涅克拉索夫，主要原因是他怕同他们思想发生分歧，再者60年代初，他主编《时报》杂志时曾和涅克拉索夫等主编的《现代人》展开过激烈论战。过了半年之后，他才终于同意涅克拉索夫的建议。

《祖国纪事》杂志从1875年第一期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副标题是《一个青年人的手记》。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访问彼得堡监狱的少年罪犯管教所，搜集有关流落街头的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的材料。俄国社会生活始终不渝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作家日记》中对当时发生的一些悲惨案件做过广泛的分析，并把那些案件，特别是对一些残酷虐待儿童的事件以及某些著名律师在为折磨儿童者进行辩护时所使用的油滑手

法，进行了愤怒的批驳。

从70年代中期可以看出，《群魔》的作者长篇小说形式方面碰到了危机。在《少年》中，更能看出他正在探索描写当代现实生活的新途径，这种探索是大胆的和危险的，他不再以刑事案件作为中心情节，明显地减弱了主要情节线索的意义，而是在读者面前提出一大堆难题，让读者自己去对他笔下的主人公作出解释。他曾经是女性肖像描写的圣手，这次仿佛故意不把她们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小说仿佛消溶在事件的急剧更替中，使得读者难以看清作者主要构思的轮廓，谢德林说这是一部“疯狂的小说”，至于屠格涅夫，则严厉指责它“杂乱无章”。

批评界指出，这位杰出作家并不理解“年轻的俄国”的意向和愿望。社会舆论对下面一个事实感到震惊：这位曾写出过《穷人》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作家，竟挺身而出维护俄国贵族阶层，他似乎把俄国贵族看成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的唯一体现者。

不过这部小说描写的并不是贵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家庭历史。按体裁说，它是一部教育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表明，培养和教育少年主人公阿尔卡基的既不是学校，也不是老师，而是生活本身以及生活中所有骇人听闻的阴暗面，但这颗天生高贵的心灵并没有屈服于那些阴暗面，他

为自己开拓了一条通向明确的世界观和富有成效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作者采用了自传这种形式来写这部小说。

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丧偶以后，回到自己的庄园。他的家奴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园丁，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和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久前娶了一个年方十八的漂亮姑娘索尼娅为妻，她也是一个女仆，父母双亡，稍微认得几个字。她立即就被回到庄园的地主老爷看上了，于是她立即抛开自己合法的丈夫，投入地主老爷的怀抱，就这样生活了一辈子。

他们同居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尔卡基，被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正式收为义子，实际上是一个“私生子”。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成了他那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这种由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对他发生了影响，甚至使他产生了种种奇怪的想法。但他仍竭力追求合乎理性的和有一定目的性的生活。

他有两个暗中教育者；一个是父亲——40年代著名的贵族宣传家，另一个是民间香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个是生身父亲，一个是他的义父。

这个天赋雄厚，讨人喜欢的少年的内心成长不是在寄宿学校里展开的，而是在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彼

得堡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是茶坊酒肆、赌场淫窟和各种“藏污纳垢之所”，不过高耸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幽静的阁楼，在那里，幻想家和思想家经常进行充满灵感的对话，他们谈论黄金时代，谈论巴黎公社，谈论欧洲的衰落，谈论如何使石头变成面包，这种历史的回光反照和奇谈怪论充满着悲剧性和诗情画意。正当这位青年探索者陷入精神上的迷惘时，突然出现了一位俄国朝圣者，他以充满民间智慧的格言谚语迷住了少年。少年终于感觉到“新生活”的迫近，但“新生活”并没有把他引入修道院的单间居室，而是引进大学的课堂。一条通向科学生活的广阔道路打开了。

少年的父亲韦尔西洛夫作为一个思想主人公，在小说中居于中心地位。他的哲学观点形式上似乎冠冕堂皇，结论往往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未来切实的憧憬。有人认为，韦尔西洛夫身上体现着赫尔岑的许多特点，这是和《作家日记》的作者本人对赫尔岑的种种评述一脉相承的。韦尔西洛夫的结局耐人寻味。老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临死前提醒自己的老爷要恪守原先许下的诺言：“用婚礼的花冠掩盖自己的罪孽，也就是说，一旦索尼娅·安德烈耶夫娜守起寡来，他就同她结婚。”

结尾时的“疯狂场面到来了。人们刚刚埋葬掉香

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临死前把祖先留下的一件遗宝——一尊会显灵的古老神像，交给韦尔西洛夫。可是这位一家之长，在慌乱的激动心情支配下，像着了魔似的，突然把那件大家奉为圣物的遗宝摔在瓷面火炉的一角上，碎为两半。这个场面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韦尔西洛夫拒不接受香客的遗物，拒不接受他的遗嘱，拒绝履行许下的诺言。他割断了同祖国历史的联系，抛弃了正教圣像，又重新追求起曾使他迷恋过的天主教形象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来了。但是作者又改变了这一判决，经历了种种迷惘彷徨之后，韦尔西洛夫的晚年生活却过得平静、明智和富有诗意。他没有摒弃祖国的根基，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虽然曾试图自杀。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一个春天，他坐在敞开着窗口旁。妈妈坐在他身边，“他用手抚摸着她的面颊和头发，感激涕零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不再离开妈妈了，永远也不离开了。”

这位世界籍的预言家进入自己生活的最后一个时期——俄国时期，他在祖国，在亲人中间，在他心爱的圣物中间度过了这一时期。他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永远爱上了她那“唯一的女皇”，那个“受尽苦难的女人”，他的“最后一位天使”——这位恬静贤淑的女人虽然出身于农奴，却以自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照亮了他那动荡不定的一生。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

使人联想起赫尔岑以及赫尔岑关于精神上返回祖国的著名论断：“对祖国的信仰把我从精神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

曾有批评家批评这部小说“杂乱无章”，确实，它是以相应的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遍布全俄国的杂乱无章。在这种风格中，小说的风俗画性质及其清晰明确的史诗则隐而不见了，代之以一些离奇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的、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但对这些情节和插曲的解释则要拖到很久很久以后，甚至拖到永远也不会到达的未来。由此就产生了故事情节的高速度发展和变化无常，这种不寻常的文学描写预示着小说家逝世后现代艺术流派的出现。难怪所有的现代派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捧为鼻祖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初从国外回来后，他们出国前委托“可靠人士”代为保管的一切财产，均已荡然无存。他们不得不重新购置家用物品。与此同时，债主们也跑来了，铁面无私地要求偿还旧债。如果不是他妻子的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他很可能遭到彻底破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债务当时已达二万五千卢布，其中有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他们甚至要求偿还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办烟草厂时所支付的一笔巨款，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兄弟的全部财产，或者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

夫斯基建议用自己每月的收入分期还债，遭到了断然拒绝。幸好安娜是个出色的谈判者，她告诉那些威胁他们的人：房子是以她的名义租的，家具是赊购的，至于把她丈夫关进债务拘留所，那样不但一个子儿拿不到，还要掏伙食费。索债的人毫无办法，只好让步了。

安娜不仅善于进行这样的谈判，她还开始独自出版自己丈夫的小说，渐渐成了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家。只是经过十年诸如此类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省吃俭用，债务才全部还清，这是在作家去世前一年发生的事。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感觉到一个精疲力尽、体弱多病的人的恬静的喜悦。经过半个世纪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以后，他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个家庭、建立稳定的生活。他终于驶进风和日丽的港湾。他曾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发出慨叹：“婚姻中寓有一个人四分之三的幸福，而在其他方面——连四分之一还不到。”他对安娜越来越依恋了，几乎一刻也离不开她。每次到文学晚会讲演，总要与安娜同行，走上讲台以后，一定要用眼光从台下听众中找到安娜才肯讲话。安娜为了使他快点看见自己，常常要用一块白手帕从脸上掠过，或干脆站起。1872年，安娜为了帮助丈夫解决经济困难，准备去亚历山大为一个会议作速记，一个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20几岁的青年人愿意陪她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产生了强烈的忌妒之心，他打碎了茶杯，从客厅跑出去，无目的地随便朝一个方向跑。后来，安娜的计划当然取消了。因为她知道，即使说服了丈夫，他一定会很快跑到亚历山大，白白花掉仅有的那一点钱。还有一次去赴会，安娜恼火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倘使这一次你还是一开始就寻找我，想在听众中找到我，那么我老实告诉你，我一定站起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那么我一定要从讲台上跳下来，追你去，看你干什么，看你到哪儿去，我一定要这样的。”安娜知道，他真会这样做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宠爱他的孩子们。他哄他们玩，为他们举办圣诞节枞树晚会，在一架儿童管风琴的伴奏下，跟妻子一起跳华尔兹舞、卡德里尔舞或玛祖卡舞，活像一个爱跳舞的波兰人。这位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对女服进行精心的琢磨与研究，就连他妻子穿的衣服也都是他代为选择的；他一向酷爱精美的物品如水晶玻璃器皿、波希米亚玻璃制品、花瓶、工艺品等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他想方设法向他们灌输文化艺术，诗歌、小说、戏剧方面的知识。他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射击》、《暴风雪》和一些诗歌作品。

从1872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常到旧鲁萨去度夏，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小镇，身心交瘁的作家非常喜欢这个安谧幽静的地方。《少年》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经过孤独的国外隐居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和人们交往，特别是同俄国学术界和艺术思想界人士交往。1872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里接待了画家彼罗夫，后者是专来为他画像的。

在开始画像的一个星期中，彼罗夫每天去拜访他们。他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变化无常，极不稳定，他跟他交谈，引起争论，注意发现他面部最富有特征的表情，亦即当他沉湎于自己的艺术构思时的面部表情，后来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画：陀思妥耶夫斯基姿态纯朴而安祥，思想深邃而广阔。

俄罗斯绘画艺术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中心。他高度评价青年画家列宾的《纤夫》：“说实在的，这很像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形象……你不能不爱他们，这些孤苦无靠的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人民应该得到，的确确实应该得到的是些什么……。”

第十三章 巨星的殒灭

涅克拉索夫是在1877年底缓慢死去的。朋友们和崇拜者都十分沉痛地预感到了死期的逼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俄国全体进步人士对伟大诗人即将殒灭所感到的惋惜与悲恸。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分享了他们的悲痛。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涅克拉索夫曾在《穷人》手稿上流淌过眼泪，而且首先对他的才华表示了赞赏。他永远记得，60年代当他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的时候，诗人曾把自己的一本诗集赠送给他，并向他朗诵了长诗《不幸的人们》的片断——诗中描写一位绰号叫克罗特的英勇果敢并充满智慧的政治流放犯，他热爱自己的狱友，理解并同情他们的处境。他教导他们要忠于祖国和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这首诗时想到了他。

两位作家之间曾有过一些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时刻，但他们的关系常因文学上的争论和办刊方面的冲突而中断。不过，他们在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接近的，而且在各自的创作中表现出了许多共同

点。

1877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探望涅克拉索夫，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他那天在监狱里看到一位女犯人捧着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彼得堡风貌素描》，使他不胜惊讶。这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特别苍白，显得疲惫不堪，涅克拉索夫的妹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回答说“很不好，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本月内就犯了五次……”12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探望弥留中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竭，但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继续写那些妙不可言的诀别诗。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之间最容易披肝沥胆，真诚相见。两个人都永远铭记着他们的第一次会晤，铭记着他们生活中那个永远难忘的历史性时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

诗人逝世于12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在他的葬仪上发表演讲。其中有这么两句：“涅克拉索夫兼收并蓄了所有那些作出了新贡献的诗人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位置紧靠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他讲到这里，人群中有人打断他：“涅克拉索夫高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两位不过是拜伦式的诗人……”（普列汉诺夫后来承认，持有这种不同意见的就是他和他周围的革命者。）但演讲者

并不困窘。“不高于，但也不低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转过脸去，冲着那群年轻人严肃地说道。后来他在《作家日记》上把这篇演讲词扩充为一篇光辉的论文。

1878年3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大清早便来到区法院，那里正在审理薇拉·查苏利奇案件，她是因为开枪射击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而被捕受审的。这次射击事件是对那位将军发布的一项令人发指的命令的回答：他竟下令严刑拷打被囚禁的革命大学生博古抑博夫，因为后者在他面前未脱帽行礼。这一判决在社会上和国外侨民报刊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年轻的女革命家并不认识那位受害者，甚至从未同他见过面，她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是为了对当局的专横与暴虐进行正义的复仇。这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政治诉讼案之一，它引起了全世界进步舆论的密切关注。被告人的个性也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

薇拉·查苏利奇身穿一件闪闪发光的黑色毛料连衣裙，她那浅色的头发梳得光滑平整，一双聪慧的褐色眼睛闪着亲切和善的光芒。她引起人们的好感、同情、爱戴乃至赞叹。她只有短短几句话的发言却非常有份量和激动人心：“……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发言更使他在欧洲赢得了荣誉，他不仅为被告辩护，还对彼得堡当局提出了严厉指控。

人们焦急地等待宣布最后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凝神屏息地注视审判的进行。他面前出现了一幅当局同青年一代展开不调和斗争的画面——那些年轻人是他祖国的优秀力量，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争取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儿？要知道他本人始终属于政府派，是国家和教会思想体系的捍卫者，是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敌人。这个长着一双明亮大眼睛，具有顽强意志的姑娘为什么使他如此激动不安？须知装着大粒子弹的“斗犬式”手枪并不能导致道德问题的解决，须知流血并不是通向真理的道路，须知斧头曾伤害过拉斯柯尼科夫，而复苏的对人类的爱则拯救了他，须知作家的思想是同“随心所欲，可以为所欲为”格格不入的……为什么这个受审女子的全身和每句话里都流露出一种崇高的人性？

正当他这样矛盾地想着时，终审结果终于出来了：姑娘被宣布无罪。整个大厅里沸腾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却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赞成这个结果。他很晚才回到家中，心情振奋，激动不已。他感到心里重又涌出一股对自己伟大的人民，对祖国青年一代的钦佩和爱慕之情。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78年夏天起，动手撰写自己时代的宏伟编年史——《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提出并按照新的方式去解决俄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年轻的俄国正在走上弑君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思想都摇摆不定，他常常对生活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解释。他从不承认有什么统一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可以把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绝望呼号用于他自己的探索：“这里，魔鬼和上帝在斗争，而斗争的战场是人心。”他同情人民解放运动，可是又否定革命的恐怖手段，他不幸处于一个暗杀的时代，这一切都使他不安。他的摇摆不定决定了他在政治方面的可悲的命运。早在1856年，他被迫第二次宣誓效忠于托特列宾将军为代表的专制制度，他从不认为自己有权背

弃誓言。正因如此，他才在《作家日记》和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表现出对政府政策的拥护和信赖，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他的转向反动以及晚年同某些著名的反动思想家如卡特科夫、波别多诺斯采夫、梅谢尔斯基、苏沃林等的接近。

波别多诺斯采夫积极协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刊物，并力图在思想方面对他施加影响，他把他引进宫廷圈子里，千方百计促使他接近皇室人物，按照他的指示并在他的协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作家日记》、《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献给了皇位继承人，他还充任了年幼的王子们的精神上的指导者。经常参加他的“弟子们”的秘密晚会。同最高当局的接近，使得首都贵族阶层也向他敞开了大门。他经常涉足于彼得堡大官显贵中间，并力图成为他们社会政治观点的表达者。

1880年11月初，《卡拉马佐夫兄弟》竣稿了。他在这部小说的提纲和手稿上花费了三年的辛勤劳动。它的故事情节，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蹲监狱期间的一位难友即退任少尉伊林斯基的经历为基础的。这位少尉原在边防营服役，后被指控犯有弑父罪，判了20年苦役。他在《手记》中被描写成一个行为放荡负债累累的人，为了继承遗产，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弑父者。可是《死

屋手记》刊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西伯利亚一封来信说，伊林斯基并没有罪，法院已正式为他平反昭雪，他白白忍受了十年的苦役生活。他是主人公之一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原型。

这部综合性长篇小说开始于1878年，它给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作了总结。这部关于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构思宏伟、布局多样、人物众多的长篇史诗，广泛反映了当时俄国的各种问题，而他始终是严格按照官方的纲领来处理专制俄国国内生活中所有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的。他所捍卫的是他晚年经常与之接触的那些官方人士的思想和偏见。尽管这样，“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所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

这部长篇编年史可归入这样一个提纲中：

一、父亲及其长子德米特里在爱情上的角逐使得他们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二、老卡拉马佐夫被暗杀；

三、审判上的错误导致无忧无虑和热情奔放的米卡(德米特里)被指控犯有弑夫罪，并被判处长期服苦役。

这些事件交替变换，把卡拉马佐夫全家人及两个女人统统卷入它的漩涡之中。那两个女人中，一个是

来自外省的“魔鬼般迷人的女人”格鲁申卡，她以自己的肉体美在老色鬼和他那个缺乏自制力的长子之间激起无法消除的仇恨；另一个是高傲的小姐，不久前还在大学念书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一位上校的女儿，她之所以对米卡怀有深挚的感激之情，是因为他曾以骑士般的慷慨气度救助过她，因而她想把他从精神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使他获得新生，重新做人。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伊万是一个才智非凡的思想家，他也想杀死父亲，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弑父者，为此他陷入疯狂的边缘。幼子阿辽沙是一个天使般的人物，他为那完美道德的化身的佐西长老所感召，舍身于修道院。真正的弑父凶手是斯麦尔佳科夫，他是老卡拉马佐夫强奸傻女人丽萨维塔生下的私生子，他是一个道德上的畸形者和精神上的活尸，厚颜无耻的西欧主义者和俄国的敌人，他也有可怕的癫痫病，由于受伊万“可以为所欲为”的口号的诱惑，他杀死了他的父亲，他把罪责一股脑儿推到伊万身上，在受到他的斥责后悬梁自尽了。

德米特里是最大的嫌疑犯，因为他不止一次扬言要杀死父亲。但是那天晚上他尾随着格鲁申卡去找她的旧情人——军官穆夏洛维奇。他加入正在寻欢作乐的一伙，格鲁申卡被穆夏洛维奇侮辱，她向米卡倾诉了对他的爱情。出现了一道霞光，预示着主人公将获

得精神上的复苏。但就在这时，副检察官指控他为弑父凶手。

最后一场戏是审判。伊万大声宣布：老头子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而教唆他杀人的则是我。”证人在一阵狂暴的精神病发作中被抬出大厅，惊恐万状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此时已将爱情转移到伊万身上，唯恐她所钟爱的伊万会因悔罪而毁掉自己。于是下定决心宁肯牺牲德米特里也要拯救伊万。她向法庭出示了被告的一封信，企图以此证明他是弑父者。这个失去理智的女人的发言变成一篇特别有力的指控词，听起来颇像是对被告的真正起诉书。“米卡！你的那条毒蛇把你给毁啦！”气得浑身发抖的格鲁申卡从大厅的另一端喊道。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在歇斯底里大发作中被人抬走。

米卡被判处20年苦役，但他却充满一种神秘的光明感——他从灵魂深处获得了新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成两部小说，第二部是主要的。两部合起来正好是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生平传记。阿辽沙的人物原型是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卡拉科佐夫，他曾暗杀沙皇但没有成功。在第二部小说里，阿辽沙将参加弑君活动。作者在1880年写完第一部后，决心过一年的间歇才写第二部，但他没有活到那个时候。

1880年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视，因为他一向认为这位伟大的诗人是人民思想最充分的表达者。他希望能以演说形式讲几句关于他的话。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尤里耶夫获知这一情况后，致函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在莫斯科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然后再以文章形式刊登在他主办的刊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同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次演讲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在离群索居的静谧环境中，他把他关于这位艺术天才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意义的全部知识和理解，都凝聚在一篇简明扼要而又完整的重要文章中。

6月6日中午，铜像揭幕仪式开始。晚上的文艺演出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登台表演，他朗诵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一场。在6月7日的文学宴会上，他就普希金作了简短发言。翌日，他第一个登台演讲，他的演讲给人们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他发挥了关于知识阶层必须同民众结合，关于用人民的真理去医治“俄国历史上的受难者”的思想。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谴责那些脱离了人民根基，对祖国的理想丧失信心的俄国流浪者时，他指的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只有实现宗教

大联合，才能使社会主义得救。

但是凭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和人民相结合道路的肯定和他卓越的演讲技巧，他赢得的不是欢呼，而是偶像崇拜；一位青年刚握住作家的手，由于兴奋过度，一下子晕倒在讲台上。下一位演讲者放弃了自己的演讲内容，而对作家的演讲进行了正确的评述。

会议结束时，兴高彩烈的观众把桂冠给了这场艰难的文学竞赛的获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他把花冠放在自己导师普希金脚下，深深鞠了一躬。

还在187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封信里说：“我躺在这里，不停地思索道，大概我快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唉，我死后，那三个对我来说就像金子一般宝贵的人儿该怎么办呢？……”年底，大夫私下里对安娜说，病情已出现凶兆，肺气肿有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任何体力活动或精神上的刺激都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在1880年他的威望猛增，蜚声全国，他在6月8日写道：“普希金在年富力强，才华鼎盛的时候死去了。毫无疑问，他也把某种伟大的奥秘带进了坟墓。如今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只能去猜测那些奥秘。”而他自己，也将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的奥秘带进坟墓。

关于库马宁家遗产的分配给了他一次致命的打击。那天和妹妹谈话后，他的喉咙里涌出了血，但时间并

不长。做体格检查时他又咯了血，接着便失去了知觉，清醒过来后，他把孩子们打发走，单独向安娜表示谢意，感谢她给他带来的幸福。

1月28日早上7点，安娜醒来后发现丈夫正瞧着她。

“喂，你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你知道吗，阿妮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小声说，“我已经有三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一直在思考，我刚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会死去。”

尽管安娜一再安慰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坚持他的话。他打开十二月党人妻子当年送给他的《旧约》。

“您瞧这儿写着：‘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安娜啜泣起来，他再次向她表示感谢，并嘱托她好好照料孩子们。

“请记住，阿妮娅，我一直热爱你，从未对你变过心，甚至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11时，喉咙里又开始涌血。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抓住他们的手，请求妻子朗读那篇关于浪子的寓言。晚7时再次咳血后，他失去了知觉，终于在8时38分与世长辞了。

在《西斯廷圣母》照片下，那张“饱经思想的折

磨，但似乎仍被内在的热情之火燃烧着的面孔”永远凝滞不动了。

两天后，不可胜数的人群把遗体护送到公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表示希望将他和被他视为文学上的教父的涅克拉索夫葬在一起，但他被葬于亚历山德罗——涅夫斯基大寺院公墓，紧挨着他所敬爱的另一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墓碑。

他的故朋旧友在墓前相继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他为俄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但他真正的被列入不朽作家之列还是在不久的将来。

高尔基认为，他的描写才能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且认为他是一个病态的天才。

由于他出色的心理描写和他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他被认为是被托尔斯泰遮蔽的又一座高峰，他进而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有限的几座高峰之一。不管他是病态的天才，残酷的天才，还是恶魔式的天才，他的天才描写都使后世的作家难以企及。

这种天才基于一种痛苦的矛盾。这颗灵魂爱上了痛苦，因为除了痛苦，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使它活下去，它为人类的苦难痛苦、绝望——名副其实地绝望，就是说，丧失了期待、梦想、青春的憧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就是一出最深刻的悲剧，是苦难成就了他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也为世界文学史

树立了一座丰碑。